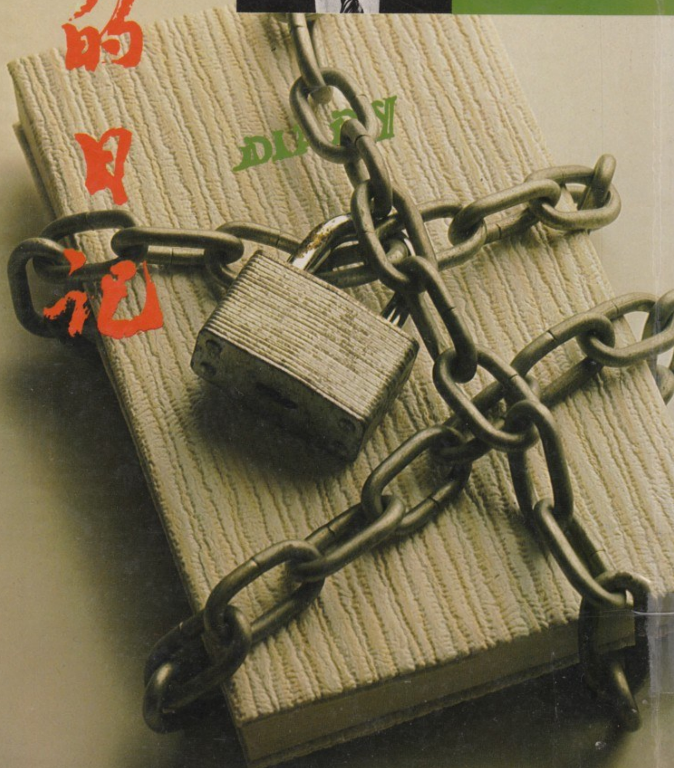
我的日記

劉賓雁

第二版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我的日记

刘宾雁·著



刘宾雁

第　　页

20×10=200　　人民日报社

作者手迹

前　言

日记本来是写给自己看的。也有一种，用于“汇报思想”，把每天自己做的好事和“思想斗争”取得的成果记载下来。这后一种日记，有时就成为公认的教材。我的这些日记，则是另外一种。

我从未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只有一九五八到六〇年那一段是个例外。那三年，正是我“脱胎换骨”改造资产阶级灵魂的时期，不知怎么搞的，它恰好又和伤筋动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碰到一起了。这一来，就热闹了：我每天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我的灵魂与世界观斗，而我的感觉又时时刻刻把妨碍我修真养性的各种现象吸收进来；于是我便必须在两条战线上苦斗不已：一方面同我的“右派观点”斗，同时又要和外界不断涌来，使我刚刚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批得稀巴烂的那些观点死灰复燃的各种现象斗。好苦呀！

你在这本小书里看到的，则是二十余年后的中国和我了。其实，我并没有、或很少真正写日记。一九七九年以前，我有时间，但生活中没有什么可

以记载；七九年以后，可记的事情忽然增多并不断增多起来了，还在增多下去，而我却没有记载它们的时间了。有人建议我用睡前录音的办法做日记，我一直没有开始。我用的办法是：经常把一个笔记本翻开摆在茶几上，有客来，便边听边记。这就成了我的日记。当然，应记而漏掉的仍然很多，有时在前一天的日记上留一片空的，准备补记。但往往一拖几天，又忘记应记的是什么了。

即使我能够记下来或记得住的，也有很多没有写在这本日记里。一是事情太多，再，就是由于中国人可以理解的原因了。

自己的日记，为什么要拿来发表呢？主要目的，是想让读者多了解一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耗费时间太多，手续也麻烦。再者，有许多事是不宜做报告文学题材的。另一个目的，是想为某些人说几句话，把事情公开出来，便会是一种推动。本来，这应该是报纸的功能，但我们的报纸不大喜欢这些东西，我便只好采取这种形式了。

把毛泽东同志那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引伸一下，便可得出这样一个原理：不了解情况的人民，是愚蠢的人民。今年满二十周年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在中国，数以亿计的人民之所以一齐

上当，便是一个例证。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相信人民群众和依靠人民群众。如果人民真能了解“文革”前那十几年的历史，了解中国社会进步的真实症结所在，我想，纵使“文革”终将发生，其进程和结局也会大不一样了。

科学技术的发展——纸张和印刷术、无线电广播、电视、录音录象设备、人造通讯卫星等等传播工具的发明和普及，甚至象复印机与中文电脑打字机这样一些工具的发明和普及，都使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突破了许多自然障碍，也使人为的障碍与禁锢逐渐被突破了，并终有一天会全然归于无效。秦始皇、希特勒、林彪与江青之流采取的焚书、检查邮件、禁止报刊发行等等一整套扼杀人们思维的办法，对于以空气为媒介传播出来的声音与图象，就无能为力了。从社会的发展看，也是如此，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在学校和专业户中的普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带进家家户户的收音机、电视机、录音录象机，国内外人们相互交流的频繁化，交通条件与旅游活动的发展，都必然会使数以千万计的人们对于外界的兴趣和获取外界信息的机会大大增多，同时，人们观察和思维的能力也必定相应地提高。这是一个社会除非它放弃发展、宁愿停滞和倒退，就必不可免地要出现、并且加速度发展的大趋势。因而，聪明的

办法就不是限制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信息的传播，而是帮助人们正确地理解和对待各种现象。须知，从这个渠道得不到的信息，人们会从别的渠道获悉，那就会造成两种不利的情况：一、当正式的传播工具久久不报道人们最关心的情况时，他们就会对它失去兴趣甚至失去信任，不再看它或听它，转而求助于其他渠道；二、这样，当人们得不到准确的、经过正确解释的信息时，他们就会从其他渠道得到不准确的、经过歪曲的信息。

尽管这本日记里写的仅仅是我个人见闻中很小的一个部分，而我本人和社会的接触范围毕竟也很有限，但读者仍然会从中看到，今日中国是处在一个何等不寻常的时代。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巨大而深刻的变革过程，正在我们身边进行。也许有人会说，关于我国四化和改革的成就的一面，我写得太少了。问题在于我只能记载我亲自接触到的人和事，而对于一个记者或者作家，找上门来向他报喜的人总要比报忧和反映问题的人要少，原不足奇。此外，既然我们的市报、省报和中央报纸每天的四大版或八大版，以及电台、电视台日日夜夜的广播，大多是喜报，至少就量上说，大好形势的报道已经不少，不需我去重复；给这些传播工具做一点点补充，岂不更好。

一九八六年三月于中国南方

一九八四年

八月十五日

算来我是第四次入川了，距一九五四年秋陪苏联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去成都，已近三十年了。三十年，竟包含着三个时代！

又想起瓦·奥维奇金。一九五四年我陪他来四川时，他比我现在还要年轻几岁。现在却已成了古人。人人无时不在朝坟墓走，而且越走越快。

乘宝成路列车，则是初次。《西安铁道报》的石玉国同志要陪我乘一段路，继续他的采访。我心事重重，想看一些同他的提问全然无关的事情。

刚刚完成今年年初以来对西安的第三次采访，每次不超过两周。在我的经历中，一年两次去一个城市的事还不曾有过，外出采访最短也在一两个月以上；而今年的河南、山东、甘肃、辽宁和陕西之行，竟都是这样短促。月初去沈阳我

只停留四天，过问了四个事件便匆匆离去，更是前所未有。这样，我仍然顾不上应该去、答应去的很多地方。一个黑龙江，就有十来个地方有人等着我。大兴安岭，我从一九八〇年起每年都答应要去，都因故未能成行。今年是无论如何非去不可了。

这次旅行的目的，是自贡铸钢厂。对一个工厂采访三次，也是绝无仅有的。从一九八〇年起，我就从这个工厂短短时间里从大乱到大治的变化中，看到了全国的希望和前景。

近两次入川采访在《人民日报》上共发表六篇报道，都是正面的。写过四篇报告文学《一个人和他的影子》、《川行随想》、《毕竟有声胜无声》、《千秋功罪》，前三篇也应归入正面文章，赞美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发生的变化的。但《一个人和他的影子》还是惹来一些麻烦，《千秋功罪》则招致更大的麻烦，尽管我一概隐去了地名和真名实姓。《千秋功罪》发表后，收到不少来信，继续揭发何忠野（假名）在去攀枝花矿山公司以前和调离以后干的坏事。关于他到淮南县煤炭指挥部以后的所作所为，还有人另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叫《何忠野上任记》。但这毫不妨碍他在北京四处告状，散发大量打字油印的材料，对我肆意进行人身诽谤。

……照例无暇观赏沿途的景致。近来，利用

乘车时间读书的机会好象也少起来了。如果大家都读书，就不会互相干扰了。

八月十七日

仍然是老章程，不和文学界接触，少同新闻界接触。一九八〇年初在四川日报社发生的那个场面，记忆犹新——我的访问使一位组长紧张得很，莫知所措，只好匆匆离去。

李芳洲，非凡然而不幸的盲姑娘，我同她只通过几次信，听过她一盘录音带。我无法想象一位盲人在一个漆黑的世界里怎样生活。失去观看这个世界的能力，本来就是一切残疾中最大的不幸和痛苦。而李芳洲——她的聪颖过人，她的敏于感受，她的自强不息，尤其是她强烈的自尊心，总之，她身上所有可贵的东西，既使她优于一般的盲人，同时无疑也使她因失明而带来的痛苦和悲哀更加倍地沉重了。

和我在一起时，她常常笑着，甚至在叙述她近几年来艰难而痛苦的经历时，也笑着。然而我知道，她平日心里发笑的时候是不会很多的。

一月间在火车中扭伤的左臂，一直未予理会，以为会自行恢复，不料伤痛却逐渐加重了。李芳洲一面接受我的采访，一面替我按摩。这一来，我就无法记录了。我的记忆力已经可怜到必须立

时记下对方每句话的程度。只好录录音。

我很难集中精力听她的谈话。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入盲人的生活。一种无以言状的感情，始终压抑着我——不是怜悯，而是为我有一双眼睛而感到内疚，为这样一位优秀的人自幼被剥夺视力而感到不平，为她和她的同伴们近年来遭到的刁难、凌辱而感到愤懑……

人啊，同情弱者并不需要你支付些什么。是谁教给你这样冷酷呢？你是有一双眼睛的，即使你看不出这位盲姑娘无论在品格、才能和奋斗精神上都远远高出你，也该懂得她和你一样是一个人；你不愿扶她一把，那也罢了，但你为什么也参加到欺负、嘲弄和践踏她的那些人的行列里去呢？你能够得到些什么呢？从这里得到一种优越者精神上的满足？以欺凌没有自卫能力的弱者为乐事？

向义光和张飙同志合写的报告文学《她心中有个明亮的世界》是获奖作品。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完全回避了李芳洲创办盲人按摩所以来经历的坎坷。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否则就难过一关——"批评稿件，必须经上级党委审阅，由被批评者过目"。然而只写光明，舍去黑暗，李芳洲的形象和她几年来的生活和形象就残缺不全了。这篇作品本来应该在如何对待残疾人的问题上起一个振聋发聩的震撼作用，它应该是一个八十年

代中国的人道主义宣言书！……

怪着呢，几年来关于报告文学真实性问题的讨论、批评和指控难以计数，唯独轻轻放过了这个作者被迫牺牲真实性的问题。这可是比个别事实、数字、时间等的真实问题要大出许多倍，性质上要高出一级的问题啊。

还不仅是写不写阴暗面的问题，光明面你不但要写足，并且要照顾周全。发明家获奖，不是也得分给炊事员和门卫一份吗？《中国青年报》记者张飙在一篇关于李芳洲的报道中，仅仅由于没写成都市东城区民政局周副局长对南暑按摩院建立所立下的功劳，就给李芳洲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聊感快慰的是《人民日报》驻川记者罗茂城同志今年五月间发表通讯《盲姑娘的呐喊》以后，李芳洲的处境略有改善。若不是这篇通讯，一个混淆是非的调查报告就可能被通过，后果就会很糟了。

八月十九日

今天我从锦江宾馆的租车处租了一辆自行车，直奔走马街，继续采访。落后工具有落后的好处，我可以随意延长这次采访，不必劳司机等候。

我把自己设想成盲人。李芳洲每天要上下多次的那狭窄的木楼梯是很陡的，我睁着双眼上下还很吃力呢。室内没有卫生设备，要越过一条往来车辆很多的马路，走进狭窄、阴暗而潮湿的公共厕所。要怎样穿过马路又穿回来，怎样摸索着找到那个厕所和找准位置呢？

楼下是一个二十几平方米的狭长房间，挂号、候诊和诊疗都在这一个地方。地面比路面要低一些，使室内显得更加拥挤和杂乱了。楼上的房间大约比楼下小一半，是李芳洲的卧室兼客厅，实际还兼作她的办公室。从地板的破旧看，这幢建筑已经相当古老。电话就设在这里。我每次打电话，李芳洲都不在楼上，我便等着她爬上那狭而陡的楼梯，心中有些不忍。

墙上挂着她带副墨镜的照片，比现在的她要胖些，面色红润，也显得年轻得多。那不过是两年以前拍摄的。我凝视着她。当她不笑和沉默的时候，就象是陷入了回忆或沉思，表情的肃穆超过常人。我注意到她有些苍白的脸上高高的鼻梁和俗称“鹰钩”的鼻头，都说这种鼻子是才能和毅力的征象。我观察过许多人，今天又得到一次印证。

她曾有过很动听的歌喉，现在却相当嘶哑了。她说，这是那几年常常哭泣造成的。她的声音和

她的语言富于表现力。我想象得出，当这个女性被激怒的时候，她是会使小人们畏惧的。于是我便想起她昨天讲过的那个场面：曾在这里工作，因贪污而被辞退的姓王的女人勾通一些人到这里大闹的那个下午，街上看热闹的人阻塞了交通。那女人用最难听的污言秽语辱骂、诽谤李芳洲，看热闹的人中居然有人帮腔。李芳洲在室内忍耐着，几位男性盲医生气得拿起利器要冲出去抵抗，被李芳洲制止了。这时，外边的群众，怀着我们民族所特有的那种好奇心，却缺少我们古人宣传很多、实行很少的仁爱之心，群头攒动，争着要看看室内这些弱者，特别是那个女子是什么模样。而室内，这些伴随无边的黑暗度过半生的人，心头充满了更加浓重的黑暗……

李芳洲追述往事时，平和沉重。当她按摩我的左臂，我只能听到她的声音时，竟觉得她象是在讲述别人的经历，而且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似的。悲痛达于极点时，也会变成淡漠吗？

今晚，事先没有检查录音机，想不到昨晚以后有人动过。已经录了将近三盘，一试，竟全都是空白！懊丧极了，心情象一个孩子受了骗，被夺走许诺给他的贵重礼物。怎么办？重来一遍是不行了。李芳洲大约从我的话音里听出我深深的失望，便再三说待我走后她自已重录。我知道，

没有一个谈话的对象，录音的效果就会不同，但也只能如此了。

八月二十日

自贡市的市街比两年前干净多了。土路铺上了水泥路面，弯路也取直了。街心有许多花坛，路旁的树木也比以前多了。

自贡铸钢厂的外貌没有多少变化。它的内容，它的地位却又有了很大发展，不久前，有二十几位外国记者访问过这里，对改革的先驱、厂长王子珍十分赞赏。

八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

同王子珍同志谈好，我要花几天时间写西安的稿子，然后再进行对自贡铸钢厂的采访。

《啄木鸟》定于九月号发表我的《拨开长安雾一层》，《报告文学》从十月号起发《犹闻秦钟汉鼓声》，分两期连载。

这是我的一次新的尝试。我今年一月第一次去西安，主要是采访与郭建英一家三十八年来遭遇有关的事；因为有个房产问题，故尔了解了不少西安市房地局的情况。《白衣下的污垢》是个副产品。第二次就不同了。《白》文震动西安，钟楼饭店我的居室终日宾客盈门，向我揭发问题、反

映情况的，很多是处、局级干部。这十二天里收集到的很多素材，本是要分别写成通讯和消息在报纸上发表的。但《三十八年是与非》一压几个月不能见报，我手里这些材料就不得不另谋出路了。而唯一的办法是写成报告文学，在文学刊物上发表。由于素材太多，我试着把几个互不相干的题材捆到一起，写成一篇报告文学。过去，除了《川行随想》和《好人啊，你不应该这样软弱》，我还从没有这样做过，但那两篇，前者带有游记性质，后一篇，也是着重写“三种人”这个主题的。这一回，西安的这些素材，却更难凝聚到一起了。

想不到两家刊物的反映还不错，甚至有人评价不低，说明试验是成功了。这两篇试产品，纯粹是靠思想把几个题材拴到一起的；这思想，当然不是凭空而来，强加于素材之上，而是来自我对西安市生活特征和全国有关情况的观察。我还要写第三篇。

这几天，我把《拨开长安雾一层》中关于西安市石棉制品厂女副总工程师唐安华的一段改写成六千余字独立的一篇，发《人民日报》作品版，为的是影响更大些。

想不到缩改一篇文章会这样费劲，竟用去我四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又过分认真了。不是在写成的稿子上压缩，而是重看全部记录和所有资

料，包括雷抒雁和孟西安写的报告文学，因而付出的劳动量就和重新写一篇相差无几了。比新写更麻烦的是我还要尽量写得与前一篇有所不同。

八月二十五日

三次来一个工厂采访，在我也是史无前例的。一九八一年夏天，我二访之后本来已经写成一篇两万余字的报告文学。在渡口，攀钢的热心朋友们还帮我打印出来了。但我不满意，总觉得还没有把厂长王子珍这个人和这个工厂九年来历程中精髓的东西写出来，始终没有发。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三篇小通讯，聊以塞责。

回想一九八〇年我初来这个工厂，立即吸引住我的是什么呢？这曾是一个可以说已经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工厂，在短短时间里实现了安定，秩序井然，并成为全国同行业的尖兵！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仅仅一年，这个厂又率先开始了改革。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写它！这个厂从大乱到大治，是全国的一个缩影。

其实，中国大部分工厂并没有乱到自贡铸钢厂这个程度。在这里，"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提前一年就开始了，也就是说从建厂起到一九七五年，整整乱了十年。"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使同属工人阶级的内迁的上海人和本地人斗个不休，

两地人内部又各有小的派别，也斗个不停。九次派工作组，九次都灰溜溜地撤走了。工人们打鱼摸虾，打牌斗殴，正经的生产活动只剩下种自留地一项了。九年中吃掉了相当于可以建造两个半工厂的资金。王子珍参加的第十个工作组进来，站住了脚，借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主持整顿的东风，刹住邪气，终于使炼钢炉生起了火，从此再未熄灭。

我当初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我设想，这个党委书记王子珍一定是一个顶天立地、叱咤风云，大刀阔斧、一往无前的带有传奇式性格的人物，属于"乔厂长"一类吧。几次谈话之后，我有些失望了。从外貌、风度和一般性格特征看，他是一个最中国化的中国人——沉着冷静，不苟言笑。那双眼睛，要在熟悉他的为人之后，才能从他的目光里看出他常常在思索，不乏幽默感，并且和善可亲，但他的下级恐怕首先看到的是严肃甚至凌厉。一切都无异于一般中国人，连走路的姿态也是中国式的。

在我的新闻生涯中，就采访难度而言，他属于中等。他能滔滔不绝地谈他的工作，但思想感情深处的东西，就很难挖出来。因而他身上最可贵的，最具独特性的东西，我就只能从他工作中有形的东西上去寻觅，而他从事的又是经济工

作，对一般读者说来属于较乏味的一种。

总之，他是一个有鲜明性格的人，但不大外露；他是思想深沉和感情丰富的人，但不大善于向一个写他的人表达。这就难了。

他，还有他的助手、现党委书记王牧民，使一个罕见的老大难工厂从崩溃中恢复到正常，又从正常跃入全国机械工业系统的先列；他们一次又一次主动要求作别人不敢作的改革试点厂，最早实行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当这种制度遇到阻力、遭到怀疑时，他们不动摇，顶住外界和内部的压力，坚持下去，时间终于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经验，除了勇于进取以外，我看无非两条。一、实事求是；二、关心人，敢于和善于用人。正是在铸钢厂，我懂得了我们已经熟悉多年的"实事求是"这条原则实行起来是多么不易——它远不是一个方法问题；它不仅要求人具备独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还得有不怕付出某些代价的胆魄。至于用人，也不是个方法问题。一个对于人缺乏感情、缺乏必要的尊重和信任的人，很难象王子珍他们那样拨开重重迷雾，看出人身上发光的品质和才干，并突破相沿成习的陈腐的看人、用人标准，使某些人眼中的朽木成为良材。自贡铸钢厂的大部分中层干部，都是"文革"中有点问

题的人。若不是大胆地起用这些有文化、有头脑又精通业务的人作"智囊团"和业务骨干，自贡铸钢厂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

八月二十七日

《人民日报》终于在二十五日第四版上发表了《三十八年是与非》。从交稿到发表，足足过去五个月。这是我历史上的一个记录。

继续采访。

八月二十九日

我发现王子珍对我并不是无所不谈，说得难听点，他向我隐瞒了一个重要问题。

这几年，我对王子珍的采访不仅在自贡进行，只要他去北京而我又在，总要谈上一两次。谈话多次涉及他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但他独独没谈工厂内部近二、三年政治上的分化。我想，他是怕我把这个问题捅出去，使他们不好工作。

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厂内的政工干部在反对"四人帮"势力破坏生产，恢复工厂正常秩序和后来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这几场斗争中，立过汗马功劳。后来，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推行改革，工厂前进的主力发生了变化。有些政工干部思想跟不上了。他们头脑中"左"的

东西比一般人更牢固些，并往往视之为正统；他们不熟悉生产和经济，对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新的现实与旧的观念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同时有些同志的个人利益也难免多少受到一些侵犯。

倒也不能责怪这些同志按旧章程看事情，“共产主义”喊得多，考虑政治工作的实效少。有谁纠正过他们和教给他们在新时期里政治工作应该怎么做吗？没有。于是就只能重复旧的内容和旧的方法了，同时又抱怨：“政治工作不吃香了”，“搞政治工作没前途”等等。

这种力量，和王子珍所要推行的改革不可能不发生矛盾。替王子珍想一想，他能怎么办！具有类似政治倾向的人，还不仅是政工干部，也不限于铸钢厂内部。

王子珍只能一边改革，一边让步了；以让步求得安定团结和对改革的赞成票。他是个含蓄而不外露的人，有一次却也流露了他的内心矛盾和痛苦，那是免掉牟祖俊厂长助理职务的时候。王子珍对牟祖俊说了一句：“对不起，为了保证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你只能委屈一下了。”

牟祖俊是何许人？最迟从一九七七年起他就是王子珍最得力的参谋了，是在自贡铸钢厂推行改革的“智囊团”中的头号人物。七年来他白天黑

夜沉浸在本厂改革政策的研究、制订和实行的工作中，累出了胃病，现在很可能还是胃癌。可以说，这家工厂每一步前进的足迹中，都有他牟祖俊的心血。

也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文革”期间他曾当过一个小小战斗队的头头。但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毫无权势欲，为人又善良，故他那几年致力于各派的联合和调节矛盾，而未去争权夺利。这也许跟他精神上的一个包袱不无关系：父亲历史上有些问题，“文革”时在军队里他就觉察到自己是一个受猜疑和限制使用的对象。他在政治上一直是自卑的。他迟迟不肯写入党申请书。

王子珍很早就看中牟祖俊是个人才。先是起用他为厂办公室主任，后又任命为厂长助理。这时，人们就清楚了：王子珍想让牟祖俊作厂长的接班人！

不久，一张指控厂内十三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的名单送到市委去了，牟祖俊自然是可疑分子。不久，市里派出的企业整顿小组进驻铸钢厂。王子珍不得不忍痛免去牟祖俊的厂长助理职务。但他也不是一个肯轻易屈服于压力的人物；那，就不是王子珍了。他新设一个“厂长决策办公室”，由牟祖俊衔头。

这次见到牟祖俊，发觉他比过去又消瘦了许

多，还是一副恬恬淡淡与世无争的样子。一个没有权势欲的人，是自由的。他既未曾为当官而苦心钻营，官运不顺也就不介意了。但是厂里却有很多中层干部为他不平，表示不满：牟祖俊有什么问题？论才论德，没有一个比他更合格的厂长接班人！

九月一日

也不能说没有一个。韩××就是一个。他比牟祖俊还年轻些，聪明干练，风度翩翩，刚刚从四川省财贸学院毕业。他是王子珍一九七五年就看中的苗子，那时他还不过是个徒工。一九八一年夏，他回厂度假，我曾和他长谈一次，觉得他对许多问题的分析颇有见地。现在他回来了，比三年前又成熟得多。他对铸钢厂情况的分析之深刻和精辟，令我吃惊。本是一个理想的厂长接班人，王子珍却不能不割爱让他到市里去工作了。

为什么呢？他没有牟祖俊那样的问题。他的问题属于另一种性质，比牟祖俊更难办，因为他触犯了我们民族最敏感的一根神经——老祖宗代代相传、后来又被视为“社会主义”道德条律的那条不成文法规。他要离婚！

“文革”期间，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一位比他年长几岁的大姐姐对他的生活关切备至。那时，

中国人在生活中、报刊上和文学作品里忌谈爱情已经多年了，革命“样板戏”里的样板英雄无一不是独身，韩××从哪里去学习什么是爱情、什么又不是呢？他结婚了，然后他才真正成熟。当他发现夫妇之间并无真正的爱情时，已经晚了。提出离婚要求本身就不道德，何况他又是在上了大学以后要求离婚呢？一个地地道道的陈士美！遭到工厂上下舆论的谴责是必然的。

他识时务，他退却了。但在世人眼中，他的品德已经出现一条大裂痕，他已大大贬值，不配担当自贡铸钢厂厂长接班人了。换一个人当厂长，利润的增长速度也许会比韩××当政低百分之十或二十，那无关紧要，维护道德的纯洁性是高于一切的。

韩××找到一个办法医治自己家庭生活的不幸和痛苦。厂里好几个人告诉我：他每晚埋头读书，房间里摆满了各种经济学期刊和书籍。他一读就读到深夜。用思想的粮食填补感情的饥饿，倒是于国于民都有益无害的。

然而，二十几岁上就开始过独身生活，对于一个人的创造精神会不会有一点儿压抑呢？这对于一个经济工作者（很可能还是个未来的政治活动家）的事业，会不会产生消极影响呢？这就是心理学家的课题了。别人，看来一时还顾不上，

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多着呢。

九月三日

工会几乎每隔一天就放一场电影。几步路，一角钱，人们就可以坐到几年前新建的会堂里看一场电影了。因为有这个方便，我每来铸钢厂，半个月看的电影比在北京一年看的还多。

今晚放映美国影片《挪威之歌》。早听说是部佳片，自然不能放过。果然很好。但一看观众席，上座率之低使我吃了一惊：连三排都没有坐满。

于是便有所感了：这样的影片，对于中国的青年观众是否也有点教育作用呢？不说美育，那离咱们的政治工作还过分遥远了。一个挪威作曲家对于祖国的爱恋，也能陶冶异国人对祖国的感情吧？他的创作生活所经历的坎坷和他不计得失献身艺术的精神，也会唤起青年人对自己人生道路的联想吧？还有，他的爱情，他的挚友对他的友情，难道对于我们的青年没有一点启示吗？……

但看来，除了《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的片子，政治工作者还没有把电影列为自己工作的手段。对青年工人志趣和生活情趣的教育，也不属于政治工作范围。

我为这么好的一部影片空空放映一场感到惋惜。

九月五日

今天是自贡铸钢厂的厂庆，九年前的今天，第十个工作组进厂后成立临时党委会，把这个工厂引上正路。这一天值得纪念。

各科室和车间，早已准备庆祝活动了。今晚，在灯光球场上表演集体舞。各车间、厂部、科研所的青年男女分别入场表演，有人评分。

气氛相当热烈。厂庆本身是件大事，而青年男女手挽着手，或扶着对方的腰肢跳舞，也是实行了十几年革命的授受不亲之后的一个创举，何况直到不久前，一个“舞”字本身就能引起一连串关于邪恶和污染的联想呢？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青年们的表情显得有些呆板，舞姿还嫌拘束，离奔放自如还远着呢。一位同志告诉我：这是由于观众席上坐着他们的父母。在那一颗颗年轻的心的深处是不是还有些别的东西，使他们一触及异性精神上便要颤抖，好象立足于罪恶之渊的边缘呢？

今夜本该是个狂欢之夜。青年们不但要跳，还应该尽情地笑和叫才对呢。什么父母，什么工厂领导，这时都应该暂停行使他们的权威，让青年们纵情地欢乐一番才是。然而我知道这是空话。传统虽然常常无形，它的力量却是巨大而无所不

在的。今晚，纵使厂长和党委书记大声号召或每人发十块大洋奖金，也不会出现十年后才会有的欢乐场面。我们必须善于等待。

我并不是批评铸钢厂的领导或青年。这是历史在这个时刻里不能不如此显现它自已，是任何人都无能为力的。今天，青年男女能把身体的一个部位碰到一起在大庭广众之下跳舞，就是了不起的进步了。其中有很多独身大龄男女，现在连党中央都在关心他们的幸福，也很不容易了。

一切都在变，都在进步。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然而铸钢厂的广播喇叭为什么每天早晨的开始曲还是《东方红》呢?这就不好理解了。不会没有人提醒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就提醒一次。是不是还有人留恋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呢?

九月六日

离北京时走得匆忙，未能把近期四川省群众来信中择其要者带来。抵自贡后，才给杨小平写信，请她帮我选一些寄来。今天收到了。

最后的一份邮件是一部报告文学。巧得很，另有一人来信，向我推荐的也是这篇报告文学的主人公。信很短，是出席《工人日报》首次全国通讯员代表会议的代表，成都的刘应章同志写来的，

时间是今年七月。

您好！常读你的作品，甚感你是剖析社会问题的……今寄给您一份被冤人在狱中写出的材料，盼能得到您的指教。若您能亲赴四川宜宾调查剖析这一事件，并披露社会，那就再好不过了。

附寄的两份材料，是狱中人和他的妻子写的。我被刘永江的经历深深打动了。类似的申诉和上访，我看到并接谈过的有多起，这个人的命运却是触动我最深的。这两封信，就作为历史文件保留下来吧。

信赖的上级领导：

我陷身于绝望的境地，抱着无限惋惜和无限希望向您们倾诉，向您们求救。

我叫刘永江，系四川省宜宾县六七三厂职工，县人大常委，县总工会常委，现年四十五岁。我十一岁在生产组学徒，十六岁参加志愿军。退伍后曾在成都钢运公司、省驾驶学校、地区粮局、印机厂等地工作过，我在三十三年的工作中，从未重视自己的名位，从未违背党的纪律，从未受过任何大小处分。我从小就怀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深情，热心于工作，一心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一点贡献。我以前搞了许多技术革新，都是提高几十、几百倍工效，减少了国家上百万元财产损失，这些都是有地、有证、有据可查的。

七五年我从屏山县调到六七三厂担任开车、修车工作。我看到厂经常发生爆炸、伤亡事故，不仅国家

财产受损失，职工生命安全也受到严重损害。我早出晚归出车，只好利用深夜构思设计，不知熬了多少通宵，白了多少头发，七六年底终于设计出了雷管自动生产线总图，七七年初被五机部六设计院的同志发现后，经国内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审定，一致评为世界先进方案，不仅提高工效二百多倍，大量节约能源、机器设备，少占用95%的高造价工房，减轻工人繁重体力劳动，更重要的是职工生命有了可靠保证。样机满足国内使用后，还可远销世界各国。经五机部批准，国内第一流火工单位的支持，样机于八一年三月终于试制完工，并压出样品雷管。雷管送部后，部领导非常满意。

为了达到阻挠这一方案的实现和迫害我的目的，县、厂一些领导向上级作了很多不合实际的反映，似是而非的假汇报，还向个别人送五粮液等，致使我的方案鉴定会从八一年三月拖到八二年九月还未开。在中央一再督促下，省的有关部门才组织了一个应付会。一直帮我搞方案的五部六院的同志，几次亲自要求参加鉴定会，都遭到坚决反对。

由于我觉得自己无私便无畏，对上下一些人的不正之风要顶撞，例：非法调人调职，包庇重用“三种人”，仗势作威作福，盗卖公章，损公肥私，乱搞男女关系等一连串歪风邪气。由此就得罪了那些人。他们上下依赖，我便成了他们迫害的对象。

在鉴定会上，东北四七四科研所一位技术权威讲：“我们去考察了美国、日本、西德、瑞典等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自动线搞成功的。我们国家有不少实力雄厚的单位花了千千万万钱也没有成功，我也搞了十多年，花了两百多万元，也失败了。”并劝导我说：“你不要搞了，我们国家人口这样多，自动化程度高了，

人员怎么安排?”

二五五厂来参加会议的几位同志发言说:“我们亲眼看到刘永江同志派到我厂试制样机两年多来,每天都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我们厂近千名机械加工工人干部都称他是‘四化’的铁人,既能实干,又能指挥,不愧为‘四化’建设的实干家。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象这样宝贵的人才的家属还是黑人黑户,靠买高价粮度日。他若在我们厂,早就把他的家属户口解决了,好让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四化建设工作中。”他们对六七三厂的来人说:“我们提议贵厂应爱护和珍惜这样的人才。”

最后,受旨前来的二位主持人也不得不承认说:“我们走遍全国各地,从未见到过这样能文能武的人才……但他的样机仍然不适宜爆炸性的生产装备,只能适应无爆炸性的生产装备。我们建议省化工局请示兵工部一定发挥这台样机的作用。”

会议后,一位主持鉴定的工程师戴上显微镜去挑样机的刺,他提出“参数不完善”。我提出完善样机的下步工作,二位主持人一口咬定他们只对样机现状审查,下一步不考虑。他们就这样给样机订了一个“暂不完善”的死罪,既达到了目的,又应付了中央。

会议后许多工程师都与我谈了话,他们说:“这两人是代表兵工部来的,我们在会上不便与他们强争。”二〇四厂工程师王阳明说:“我在会上刚发了两句言(老刘的样机有它一定的独特之处,还有它的优越性),那两人就冷视了我几眼。因他们的样机三次试作,部和厂都派我去帮助搞了一个多月,均失败了,根本不能与你的样机相比。”当时王阳明同志还安慰我说:“老刘,你要想开些,如你的样机成功了,就失了他们的面子,他们怎能支持你呢!”

鉴定会后，我对样机仍抱着很大的信心，决心不让样机成为一堆废铁，决心不让人民的上万元花费付之东流。我开始搞样机的下一步完善工作。八二年十月，厂里派我到重庆出差，我决定顺路到广州，找姚兰英工程师帮助完善方案，找全参数(因姚工是六院派来协助我搞方案的)。姚因工作需要调到广州，与我分手时讲："你今后的工作有什么困难，可来广州找我"。我从广州回厂后，厂里说我投敌叛国，勒令我写检查，扣我工资、奖金，令我下车间打铁，搞倒铅板的剧毒工作。厂里还没收了我的一切绘图用品，连一支铅笔也一定收回。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搞成功一个结论方案，不仅可以每天节约两百多公斤煤，还为广大工人提供了方便。厂领导知道后，责问我："谁叫你搞的？"这就是他们对我工作的态度。

信赖的各上级领导，我面对这么多打击和迫害，仍未放弃革新工作，还在日思夜想地为四化献身。我这样的行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吗！适得其反，县里一些人利用这次打击刑事犯罪的机会，在八月十九日将我打进囚狱，剃成犯人头，又暗使王所长带上几名干警每人手提一根电棒，找借口将我几顿毒打。电棒打断了又换，打得我遍体鳞伤，还将我同死刑、死缓犯一起关押至今。对我监视特别严厉，我只好深夜在被窝里摸黑写信向上级反映情况，向党呼救。我迫切希望上级领导火速派人调查解决，做出最公正的裁决！！！

此致

敬礼！

宜宾县看守所在押犯人

刘永江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一日

英明、伟大的上级领导：

我是刘永江的家属，我仅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刘永江几十年来一直把精力放在工作上。自从与他结婚以来，我就盼望他在什么时候能同我欢欢喜喜地、安安静静地过一个星期天或节日。但他每天总是早出晚归，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就走了。就是在家里，手中也总是图纸啊，书啊，他就这样整天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为什么倒成了罪人？我敢用全家人性命担保，他从未做过有损党和国家利益的事，为什么要被关进囚狱？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啊？

我家从一九七八年就被县里非法搞为黑人黑户。全靠买八角——四角一斤的高价粮度日，又加上刘永江长期在外蹲点制造，为方案到处奔走，生活异常困难，节衣缩食还是欠了几千元债。现在债主三番五次逼债，刘永江被抓后又停发了工资。我一家还有六口，就吃我做临时工的四十五元工资，每人每月七元五角，还要买高价粮。上级啊，请为我算算我一家人怎么生活！

刘永江被抓了一百七十多天了，为什么既不放也不判？我全家上至八旬老母，下至年幼小儿，咬紧牙关熬了近半年了，现在实在无法拖下去了，万望上级救命。

上级，刘永江无罪坐牢，搞革新反遭迫害，冤啊！我家孩子无钱上学被葬送前程，八旬老母气病无钱治疗，屈啊！

上级领导，渴望你们火速为我全家主持公道，救我们出苦海，不然我们是死也难瞑目。

冤民　　李天蓉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三日

九月八日

刘永江的命运令我十分不安。我给报告文学的作者写信，请他再补充一些情况，自然也表示了我们要过问这一案件，可能的话还要加以报道的意思。

不料他和另一位热心的同志竟从宜宾来到自贡，到铸钢厂找我们来了。证实了刘永江的自述，还补充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情况。原来刘永江不仅仅是一个天才的技术革新能手，还是一位积极的政治活动家呢。

这场悲剧，从他本人方面说，完全是由他天性中那些优于常人的东西造成的。他十二岁上由于家境贫寒不得不以劳动谋生，只读了两年小学。那一年，他在打铁的时候就想出一个减轻劳动强度的点子，改良了工具，完成了第一项技术革新。他如果把兴趣仅仅放在技术事务上，生活也会顺当得多。但他过于热心公益，又过于热心真率，就惹起工厂领导人的不满了。比如，当众指出和纠正其中两人技术上的失误（眼看一块贵重金属要被他们糟蹋了），就使人家丢了脸。本来县委领导对他还是不错的，不然他也当不上县人大常委。可是他又过于认真了，以为既在其位，应谋其政，就按规定行使起自己的职责来——对于县委提出

的政府干部任免名单，根据公民向他揭露的情况，直言不讳地一一指出某些人的问题，反对他们担任县政府的领导职务。这，还能不捅马蜂窝？名单是人家县委领导决定的，自有人家的道理。你刘永江算老几？连个党员、干部都不是，“人大常委”几时行使过这种权利！……

一个可爱的人，一个可敬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悲剧性格。但是反过来说，一个当代中国人，没有点唐·吉诃德气度，没有点傻劲，能干成什么事情吗？

一些人过于聪明了，利害感往往会压倒是非感。《人妖之间》里写的那位县委刘哈哈书记式的人物，实在太多了。

我们同宜宾来的同志商定，找一个日子，再请了解宜宾县内情的几位同志谈谈。我们不宜去宜宾，那地方太复杂了，我们目标又太大，找人来，也未必敢谈。需要找一个离宜宾和自贡都不远的地方会面。

有点象斯大林与罗斯福、邱吉尔会谈似的，要找一个对双方说来距离大体相等的所在。

九月九日

按约定的时间，我们到达了长庆机器厂。吉普车行驶大约两个小时。

李××同志已在工厂招待所等我们。他在修改一个本子。招待所有两处，这是新建的标准较高的一处。外商常来，这样的住处还是需要的。

厂工会俱乐部主任是位很热情的人，也从事文学创作。从他口里，我听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个厂党委作出决定：大大缩减政工人员，撤销党委的组织部和宣传部，增强工厂的经济、技术部门，由工厂的人事科和工会俱乐部兼司党委那两个部门的职能。这一来，政工人员就减掉了三分之二。显然，这是个进步措施，也是经济改革逐渐渗入政治领域的一个征象。

我们是八点多钟到的，照理说约见的人也该到了。但左等右等，不见人来。报告文学作者来了，也不懂约定的人何以不来。打电话，已找不到人——今天是星期天。没法儿，只能继续等下去。中午饭吃过了；还不见人来，这才决定派我们的车子去宜宾接接看。

偏巧我这次出门没带一本书，时间的流逝就显得分外难挨。

我心里自然不可能不产生疑念：是不是这些同志有了什么顾虑，变卦了呢？这是完全可能的。抛开刘永江案件不说，跟我接近本身就有点不祥。一九八〇年我留在成都过春节，目的是利用假期完成一次采访。说好大年初一去那位同志的家，

想不到他竟怕我怕得躲了起来！

到快吃晚饭的时候，派去的车子还没回来，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只是为白白浪费掉的这一天时光感到可惜。嗐，又一个想不到，他们来了！原来是因为找不到车子误的事。

坐下来谈话，已是晚八时了。录音机录下了四盘磁带，已是午夜。很满意，了解了刘永江事件的社会背景，总算不虚此行。

九月十日

刁金祥是我的哈尔滨老乡，又是我一九八〇年采访过的对象。那时他还是东新电碳厂的厂长。我那篇通讯的题目是：《成功的秘诀》。意思是：一批从哈尔滨电碳厂分出来的职工，八千里路云和月，从东北来到西南的山沟里落户。地理条件、生活条件都远远不如大城市哈尔滨，生产成绩怎么会赶过了老厂呢？

当年从战备考虑，把许多现代工业企业迁到或建到偏僻的山沟沟里，大约没有想到这会给职工生活和工厂管理带来什么不便。大工业是城市的产物，反过来又创造城市；它是离不开现代城市的。自贡市几乎每个工厂，都必须自己来重新建造一个小社会。吃喝拉撒睡和生老病死，直到派出所，都得由工厂管起来，自然又都是平地起

家。但最大的持久性的困难，还是人心思归。

牢固的乡土观念和亲族纽带会给现代化事业造成障碍，我也是在四川的成都、自贡和渡口才体验到的。一九八一年在成都，一位东北老乡向我大讲黑龙江的优越性——家乡的猪肉都比南方的香！他讲得很细致，把东北和四川的猪肉从形状到味道做了一番全面的比较。东北人到四川二十年，都在这里抱孙子了，还是一心想回老窝儿。四年前和现在，自贡的厂长们一见我面就说道的，都是这个问题。可见，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思想、感情和习惯里，并不都是先进的东西。

刁金祥，北人南相，却不失东北人特有的胆魄，兼有南方人的机智和细腻。一年多以前被选为自贡市长，政绩不错：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条件下把自贡市城市建设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目的之一也是使这个城市变得更可爱，对于思乡心切的人有更大的吸引力。经过市委领导干部的多方奔走，自贡市的头号问题——建造从水库输送净水的工程浩大的管道，终于开工了。水的严重污染，是这里最头痛的问题。前几年听说，卫生部懂行的人到自贡，都不肯在这里过夜，怕的就是那个水。

老刁的一席话，引起我的兴致来，要写一写自贡市。城市建设固然也值得一写，但我的兴趣

却不在这里。他无意中说的一句话——他和市委书记王效才素不相识，以及他如何不想当这个市长，最后被生拉硬拽到这张椅子上来这个情节，使我想起不久前离开的西安市；这两点情况同那里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中国毕竟还有并无官瘾、不是千方百计当官而是费尽心机不当官的人！而这样的人却又非当官不可，这个事实本身不就说明自贡市领导班子里不存在拉帮结伙、任人唯亲、一把手下台前按自己模样找代理人的问题吗？这是政治清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九月十日

今天是中秋佳节。我们没有赏月，也无月可赏。不知北方的农谚“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预兆丰年这个规律在四川灵不灵。

《自贡的喜与忧》写好，打印几份，今晚请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审阅和提出修改意见。

大家对通讯提了修正和补充意见。又是中国人固有的谦虚，一再表示不要写自己。

真希望对于我写的任何文章，讨论时都能有这种和谐而愉快的气氛！

九月十一日

原计划九月十三日由蓉飞京，连机票都预订

了。我知道北京有重要事等着我。但《现代作家》月刊主办的笔会，有几位被邀请的作家未来，需要我充数。本非所愿，但我素来是最容易被说服的人，面软心也软，经与北京商量，答应留下来了。

这就要讲话，还得讲两次。无非是时代，作家，生活之类。这是我第一次在四川公众场合讲话。粗率如我的中国人，心里也不能没有顾虑。要安全，也容易。谁不会老生常谈和人云亦云呢？然而那还有什么意思！听众固然会更失望，自己也是活受洋罪呀。那就会和念别人写的讲稿差不多，我相信这种事是人类生活中最乏味的活动之一——无论对讲话人或听众，都一样。但是只要你用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的思想，而且不写讲稿，就难免有些话说得不那么全面，分寸上不那么准确。一时冲动，或并未冲动，只要说出别人未曾说过的话，那就是可疑的了。

不讲话，是不是就能保证安全呢？也未必。一九八〇年春我的四川之行，守口如瓶，从未在公众场合露面，仍有人奏了一本，说我在四川煽动青年上街闹事！

旧习难改，我还是讲了话，讲的还是自己的话。

九月十四日

按约定时间去四川省委见杨汝岱书记。刘永江的事，他知道，而且一直很重视。他看过《工人日报》记者范玉章同志为此写的一个材料，并早已让宜宾地委和县委抓紧处理。“关押十三个月不审理，这是违法的嘛！”——他很气愤。

梁秘书对刘永江的命运也十分关心。汝岱同志让梁秘书向地委电询有关情况。

深夜，梁秘书在电话中告诉我，汝岱同志已命令立即释放刘永江。

九月十五日

终于见到了成世凤。我误把“成都信箱”等同于“成都市信箱”，以为她就住在本市，却原来她的工作单位在广元县，要乘汽车再乘几个小时的火车才赶到成都！

她给我的第一封信，写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时。不久前，我又重读了这封信，觉得非见她一面不可。

她是从《一个人和他的影子》得知我曾到四川“写真人真事”的，于是就写信向我推荐另一个“真人真事”：

……还有一个死在“四人帮”屠刀底下的年轻人，他至今还是一个冤魂；他的家人至今还处于悲苦之中。他和张志新烈士的思想、行为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比她多跨出一步！……“大树特树”、“顶峰论”一出来，他就敢说那是“个人崇拜”，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唯物辩证法的”；江青高喊“文攻武卫”，他就写诗“龙虎格斗庶民怨”；人家说“右派是社会渣滓”，他敢说“其实那是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只不过少了点奴颜媚骨”……别人忙于炮火连天的战斗，他却步行了几个县搞社会调查，并且与我们几个青年学生一起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我们拼命地读书，读政治，也读文学，历史。我们的小读书室里经常有通宵达旦的讨论。这时，已经有了风声，“反毛泽东思想的狂妄之徒”的帽子已经扣到我们头上，各种诽谤向我们涌来……我们带着极大的苦恼与惋惜，将许多读书笔记付之一炬，然后大家作了一些约定。他——我前面讲的那个青年昌世平说：“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让我们在众寡悬殊的斗争里毁灭吧！勇敢的死，是幸福而光荣的！”

就这样，他戴着“反革命组织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大头目”的桂冠被关进了监狱。而我则以小头目的罪名被发配到农村监督劳动。

狱中的人受尽严刑拷打。我如果有时间（不，是您如果有时间），我一定告诉您，“四人帮”法西斯专政时期的监狱是世界上最没有人性的监狱！您只要听听这句话，就会知道狱中人的境况了：“你有硬骨头，我们监狱是镪水池！这里关死的人不是一个两个！你绝食又怎么样？”

他们一直用死威胁着昌世平。眼看就要到那一天了，与其束手待毙，不如作一次最后的斗争。于是在

一个当过侦察兵的共产党员的掩护下，他越狱了。被抓回来后，他绝食七天七夜。因挨了一刺刀，得了破伤风，再加上“特殊处理”，已奄奄一息。于是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九日（真巧，是“一二九”运动纪念日！）的下午，夕阳西下的时候，昌世平被杀害了。……

事后我还收到了青年们写给他的挽诗，其中一首是：“一面悠悠盼佳音，晴天霹雳震人心；世有良才天不允，巴山泪雨向东溟。”

我们在锦江宾馆屋顶的酒巴间谈话。没想到九月的成都天气竟会这样凉，一件单衣已抵御不住晚风中的秋意了。

成世风告诉我，他们的家乡忠县，古称忠州，因古巴国（周朝末年）出了一位忠臣——“断头将军”巴曼子和三国时的西蜀猛将严颜，唐以后始称忠州。她对家乡的热爱，溢于言表：“县城座北朝南，与翠屏山相对，滔滔扬子江流经它的怀抱。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山城，古迹甚多。城里有古巴王台、巴王庙，白居易曾作登古巴王台诗。还有苏东坡写诗赞美过的屈原塔。此外还有‘白公祠’、‘四贤堂’、‘太保祠’等，‘太保祠’是为纪念抗清的巾帼英雄秦良玉而建……我是多么热爱我那可爱的家乡！尤其是那城东四十五公里处长江北岸上，更有奇观异境‘石宝寨’，且不去说关于它的美妙神话传说，当我们登上那四壁

如削、拔地十几丈的古寨孤峰之巅，顿时山河尽收眼底。不禁要张臂赞叹：'啊，祖国！啊，我美丽的故乡！……'"

但是，她对故乡的感情又是矛盾的。"滔滔不绝的扬子江，陶冶了我们反叛的桀骜不驯的性格，然而曾几何时，我又变得那么恨它了；我从心里诅咒我的家乡，骂它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鬼地方！我深恶痛绝它那小市民的庸俗、浅薄、趋炎附势、保守、落后！不过终究还有好人，好人居多啊！在那窒息人的高压和恐怖中，若没有基层干部的同情和支持，我是逃不出老家的！一九七二年底，我携着我初中毕业的妹妹远走他乡了。"

昌世平家境贫寒，被保送上了师范。十七岁就出来教书，人称"娃娃老师"。他自幼酷爱文学和写作，熟悉古今中外著名作家及其作品。他时常写信向县委提出有关教育工作的建议，也大胆揭发了学校校长徇私舞弊的行为（此人后来就是"文革"中整他的干将）。他在办公室墙壁上写了两个条幅："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应该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后来竟然也成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罪状。

昌世平见难免一死，就决定在那位战士协助下越狱。他们夺得枪枝，边战边逃。昌世平不幸

负伤了，那位难友叫他赶快逃走，自己在后边掩护。昌世平逃出狱门后，发觉军警已向监狱的方向开来，便躲在一个小桥下边藏身，但终被捕获。（他入狱时二十四岁，被杀害时年仅二十七岁）。那位掩护他的难友，早已殒命。现在那附近的一座山上有三处立有烈士石碑的坟墓，掩埋着追捕逃犯被击毙的三名狱警。"反革命分子"昌世平和他那位难友没有坟墓，现在人们已经找不到他们的埋骨之地。

粉碎"四人帮"以后，成世凤靠她自学的英语，从事翻译工作，同时教高中班的外语，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但她始终为昌世平不得平反和他一家人继续当"反革命家属"而不平和苦恼。昌世平的父母是老实农民，忧愤成疾。三弟在部队年年是"五好战士"，被选入海军部队当潜水兵，因株连给刷了下来。下面几个几岁、十几岁的弟弟也被一一赐出学校大门。

成世凤愤愤地说："这个冤案即使不该平反，也应该向我们解释个道理吧？可是至今没有谁正视过这个震惊几十万人口、甚至通报过全省、全国的忠县一案！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应该维护，但是难道'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等于无产阶级专政吗？如果说昌世平因为违犯了他们的狱规越狱了，没有规规矩矩挨他们枪毙而后再平反和追认为张

志新式的英雄，那么他的家人——那在旧社会受尽苦难、热爱中国共产党的老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可是无罪的啊！刘宾雁同志，请您给我一个回答！”

我难以回答。我想起一九七九年以来收到的从狱中寄出的几封信。都是“四人帮”时期被定为“反革命集团”而服刑的犯人写的。我曾把这些信件带到四川，然后又带回北京。他们之所以迟迟不得平反，是因为有过超出反对林彪、“四人帮”这个界限的思想和言论。

成世凤并没有沉陷在对历史的痛苦回忆中。她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起她在成都工作和投身改革的几位年轻的友人。她说这些同志很想见见我。我自然也很想认识他们，但要到笔会参加者从峨嵋山回来之后了。

九月十五日——九月十九日

对于游山玩水仍然兴致不高。登峨嵋山，暴露了我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几分钟一停，到达金顶时比祖慰、楚良他们整整晚了两个半小时！后一半路，我喘，不知是高原反应，还是我的“轻微肺气肿”又有了发展？也难怪，那天官义同志来，发觉我上三楼都喘，就很吃了一惊。

回到成都，我就找《工人日报》驻川记者范玉章同志。他为刘永江的事出了大力，令我敬佩，

他不找我，我也要找他的。有这种精神的记者或作家，若能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就好了。电话无人接，终未见成。

成世凤嘱我要见的那几位青年改革者，和我捉起迷藏来，他们找我，我不在宾馆；我打电话找他们，他们又不在。终未见成。

十九日乘班机返京。应是七时起飞，一个多小时后仍无动静。找机场值班主任问，他说明了情况。“为什么不告诉乘客呢？”“机组人员吃饭，不好说。”“那你可以广播说，‘因故’推迟多少时间嘛。”“好，我可以广播。”“‘可以’，意思是也可以不广播？你告知大家，人家可以去吃饭，打个电话，或者退票嘛。”

抵北京机场，拿到行李，已近十二时，出租汽车没了。乘大汽车到美术馆民航办事处，市内公共交通都已收车。

在机场听接客的人说，北京也没有广播客机晚点的事，人们只好傻等。

这就是中国最现代化交通工具的管理水平！

这水平和乘客的性格是相适应的；不会提抗议，多半也不会告状，再说，“告又有什么了不起！？”

九月二十二日

收到刘永江女儿、十九岁的刘瑛的来信，这孩子受父亲牵累，县里招工她考试成绩第一，硬是不予录取。

> 我父亲已于九月十四日下午返回家里。
>
> 伯伯，在小胡阿姨的帮助下，我和我父亲昨晚八点到达了自贡市铸钢厂。大家对我们真好，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原来"好人太少"的认识完全错了，世界上好人和正直的人还是占绝大多数的，只是我原来没有遇到。我父亲正在整理一些资料，准备过几天给您老寄去，这封信就只好由小女代笔……

九月二十五日

收到刘永江的来信和长达十余万字的自述。自述的前言，开头是："党呀，慈母！我含着满眶热泪，千声万遍、万遍千声地向党喊冤，向慈母求救，也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千次万回、万回千次地感谢党，感谢党的好干部，是你们把我救出了苦海——监狱！"

十月十五日

看到刘永江写给《工人日报》记者胡舒立同志的信：

尊敬的小姐，你好！

小姐呀，你为了救我全家，越过千山万水，为我东奔西跑，劳累奔波，汇报反应，发表演说，我终于获得了自由，一家老小重新团聚。你又拿这样多钱叫我补养身体；你送我到自贡，我们父女一路生活全由你照应。我现在受到自贡铸钢厂领导和同志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厂长、书记、工会主席、秘书等同志都多次来看我，还送了不少礼品，如奶粉、苹果、鸡蛋、蛋糕、水果糖、猪油、麻油、桔子罐头、煤油炉、锅，就连鸡也是煮熟送来的……

小姐呀，我来厂寸功未立，给工厂增加这多麻烦和开支，我内心有愧呀。我只好暗中告诫自己：一定为帮助我出狱的同志们争气，宁愿少活二十年，也要搞出技术革新成果来报答大家，不负工厂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

小姐呀，你是否百忙中抽时间给铸钢厂来封信，一方面替我感谢，同时请他们不要再这样做了，我确实太过意不去了……

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二十日

西安不断有信来，有人来，有材料来，对《三十八年是与非》表示态度和提供更多的情况。

《犹闻秦钟汉鼓声》，《报告文学》本来十月号上还是要发表的。因为九月号广告上预告了这篇文章，便接到出版局一人的电话，"我们要审稿。"编辑部一听，知道不妙，便答曰："那篇稿子我们抽下来，不用了。""不用，我们也要审。""你还要审？——你找作者去吧，我们已经把稿子退给

作者了。”

我一直在等待那位打电话的同志到我家取稿审查，两个月过去了，不见踪影，有些寂寞了。

出版局出面审查一个刊物的稿子，好象迄今还未听说过。有点怪。这一怪，就刺激了我的好奇心。再不来取稿，我就只能送上门去了。顺便打听一下，从《时代的报告》到《报告文学》，几年来发了数百万字稿子，您都不曾审过，为什么独独对《犹闻秦钟汉鼓声》这么感兴趣呢？是特别喜欢我的作品吗？现在我把那篇报告文学改写成小说了，题目不变，您还要审吗？

十二月二十五日

袁鹰明明比我早两天来报到的，我却成了第一个到达京西宾馆的大会代表。大会工作人员已经相当忙碌。王南宁和往常一样精神饱满，喜形于色，象刚刚起床并且知道会领到一份节日礼品的孩子一样。但今晚她好象还得到一份意外的礼品，悄悄对我说有好消息要告诉我。我猜得出是什么，因为在《人民日报》已从小道听到一些。

晚饭后，她来了。果然是那个消息，不过详细得多。二十日中央书记处几位领导同志对这次大会的、也是有关文学界的谈话，概而言之，是创作自由和民主选举。当然是莫大的喜讯。这次

大会选择的时间实在是太好了。

心中一闪：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书记，怎么倒要向作协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打听这个如此重要的消息呢：在这次作协会员代表大会开会的前夕，向我们传达一下也好啊。但这一丝不快的心绪，很快就消散了。比这令人更不快的事，不是也差一点成为现实吗：作为社会团体的中国作家协会，竟需要由别人来指定一个领导班子！上中学的时候，都未曾由什么人代劳选定学生会的主席。莫非说中国人的退化已经达到作家不如中学生的程度了？

缺乏民主习惯已成为一种习惯，所以既不足怪，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责怪。

知道今天是唯一一个自由的晚上，便到月坛北街去取一位朋友捎来的药品。没有早去，是因为京西宾馆离那里近得很。乘小车，往返二十分钟足矣，我却整整花了两个小时。四路车，久等不来。改乘地铁，又等了半天。十五路过去两辆，都是“区间”，空车开走，尽管站上已站满了去儿童医院“以远”的人。改乘十九路，售票员又未告我应在“月坛”站下车，坐过了一站。最奇怪的是归途等一路和四路车，整整二十几分钟，两条线路不见车影！我本已学会逆来顺受——用等车和乘车的时间构思点什么；今天却烦躁得很，

什么也想不下去。只有一个念头：这两小时我可以写多少封复信啊！

东西没有取到，但小有收获：会见了两位青年读者。姐姐是工人，诗歌爱好者，喜欢四川的《星星》，很爱叶文福的诗，问我为什么几年不见这位诗人的新作？《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究竟有什么错误？……他犯了什么罪呢？

我只能告诉她：听说近年来叶文福又写了很多好诗。总有一天你会在报刊上读到的罢。

完全出于偶然，竟和作协代表大会连上了。出来随便走走，无意之中就能碰上真挚的读者。这难道不是中国作家和诗人的幸事吗？

完全没有想到，今天竟是圣诞节。半个世界此刻正在那里狂欢，我却一个人在京西宾馆的五层楼上发呆。若不是来了三位老乡，就会更寂寞了。张笑天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胡昭在暗处没有看清。顾笑言是在《小说月报》的照片上认识的。三人竟有二"笑"。也是个好兆，粗粗一谈吉林文学界，就不免说起叶文福以外的另一位青年诗人。*

---

* 指著名青年诗人曲有源。一九八三年被捕于吉林省。他的命运受到许多诗人和作家的关注。中国作协吉林省分会领导尤其重视，并表示过异议。他的妻子曾求助于我，我曾企图过问，但因缺乏足够的勇气而作罢。这就是中国作家群的现状。一九八五年，曲有源被宣布"有罪释放"。据说中国作协领导对此起了一些作用。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上届理事会的一百四十三人中，已有十四人去世。上午到会的理事，仅八十余人。下午又降为七十余人，勉强过半。周扬和冰心卧病不起；缺席者多数是因年老体弱，或因有要事在身；但也有因其他原因不来的。

新疆代表、维吾尔族诗人克里木·霍加，这时已写完一首短诗，叫《冬天流着泪走了》："春耕季节已来临，大地处处春光明媚。唯几片残雪还躲在阴暗角落，那是冬天流泪的脸，那样悲伤，那样憔悴。它是流着泪走的。也许，离别对它是很痛苦的，不然，它怎能轻易下泪？"

理事会上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名单。

李宁送来《三月风》。好不容易，终于出来了。我的《中国有个唐安华》，一万余字，误植竟有十余处之多，有的把意思全搞反了，读者又不能察觉。校对者不全是疏忽，有些是自作主张改错的。西安前市委书记陈元方竟排成"陈之方"。我只能向人家道歉了。一个晚上的情绪被破坏了。可见，办刊物，用人必须讲究精。

我对门，住着李国文和吴泰昌，张贤亮、冯骥才、李陀是常客，进进出出，高谈阔论，甚是热闹。我忍不住也过去闲聊。张洁也来凑热闹了，

因玉体欠佳，便躺在床上发言，大开我的玩笑，似欠友好。房间号"516"，于是戏称为"五一六俱乐部"。

十二月二十七日

按原定日程，今日应继续开理事会，因昨日已选出主席团，似乎无事可理了，今天便闲了下来。

开始听到一些省份文学界新的情况。全国各省区文联、作协班子与文学创作发展的情况真是太不平衡了。东三省文学界不存宗派，同某大市与南方个别省份几年来明争暗斗闹得不可开交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甘肃省虽地处边远，文联与作协的班子之团结，思想之解放，居全国前列。不料在去秋那一阵冷风以来却屡遭不幸。最近，两位党组书记皆被免职。美学家、画家、作家、兰大学生中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高尔泰竟不准讲课、不准招研究生、不准出书、不准发表文章。当得知他要离去时，又恐于已不利，赶忙以优厚物质条件相诱，但高仍去了四川。学生要求他作一次告别演讲，告示贴出，竟两次被撕毁！但小人们却无力破坏那次演讲空前热烈的动人场面：只容四百余人的台阶讲堂，挤进七百余人。地上、窗外，处处都坐满了听众。那位有权压制和反对

他的人，如果不久荣转时，是否也能有幸享受一下这样的告别呢？

全国总的发展趋势是令人欣喜的。比如河北，我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大的变化。那是一个十年浩劫中遭灾甚重，至今“左”的流毒仍很严重的省份，而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和书记高占祥竟能对文艺发展给以极大重视，实在出人意外。他们称作家为“国宝”；鼓励文学青年自学成才和成立文学社团，还提出建设“文学第三梯队”；要求文艺评论以“浇灌鲜花”为主，大兴求实、团结和争鸣之风。五月召开的全省中青年文学创作座谈会，省委书记高占祥到会六天，与大家朝夕共处。十一月的全省业余文学创作座谈会，高扬与高占祥又一连三天出席会议。作协分会全年经费原来只有一万五千元，省委拨款十四万元支持。省委领导同志还倡议设置“河北文艺振兴奖”和成立“河北文艺振兴奖基金会”，高占祥任名誉会长，亲自召开会议筹集基金。两位书记首先捐款。现已筹集基金五十万元，估计很可能超过一百万元。

刘真和铁凝住的房间号码不太吉利——“913”，好处是令人牢记不忘。刘真是我的老朋友了。铁凝则可以说是初见，记得八三年的一次发奖会上，她曾在我眼前闪现过一次，只记得脸红红的，发黑黑的，比现在要胖，而现在则比那时

显得成熟了。刘真使我高兴，因为她仍然保持着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少有的生活激情，精神也比前两年旺盛多了。我是到“913”看两个人的，不料却找到两匹马。刘真刚刚为《长城》写完报告文学《一匹马的冤案》，故事离奇得只有中国人才能信以为真，实在太有趣且发人深思了。铁凝也有一匹马，也是报告文学的主人公。在《美从东方来》中她写了一位伯乐发现千里马武宝信的事，现在这匹马却面临被伯乐宰掉的危险！

也是河北省的特点吧？她们为本省刊物《长城》拉稿的精神真够惊人的。

我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意见，看来也是许多代表的想法。既然现在发给大家的第四届作协理事候选人名单是九月十四日以前各省提出的，不完全符合中央现在有关选举问题的指示，况且当初有些省份名单的提出也并未通过民主程序，就应设法弥补。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扩大这个名单，这样，代表们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原定差额20—25%，若扩大为50%就比较合理了。

在那次主席团会议上，一些老同志也主张作协新的领导班子中要有一些中青年。

萧军同志说：“我希望一代比一代强。我过去就提出过‘文坛上的布尔巴精神’。塔拉斯·布尔巴

是果戈理小说里的一个人物，他看到儿子超过自己很高兴。选举不要有条条框框，照顾这个，照顾那个。搞民主，我首先赞成，谁合适就由谁来领导。我希望由年轻的同志干。"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上午举行全体代表的预备会议。由唐达成传达了十二月二十日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扩大创作自由，这是所有作家多年的愿望。至少是绝大部分代表都非常兴奋。

我想起一九八〇年初在成都拜访老作家艾芜同志时，他见面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什么叫'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界限一天不搞清，中国文学的繁荣就没有希望。"四年来，这个问题不断出现在我的脑际：中国作家们手里的创作自由，诚然比过去多了。但是不是已经到了太多的程度呢？自由和自由的滥用是两回事。永远会有人把自由用到不该用的地方，那是少数人。能否因此就来限制多数人的自由呢？……这几年创作界几乎没有一个人不遇到、不思索这个问题，却未见公开讨论。

"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词，始见于五十年代资本主义报刊，是用以概括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文艺界与思想界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中自由逐步扩大的

过程的。那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吗？或者，那个“自由化”是资产阶级式的吗？我实在被弄糊涂了。“自由”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的阶级性在哪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不真实、不彻底，因而需要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使自由变得更真实更彻底呢？还是自由本身就有若干种，人类在资本主义阶段赢得的那种自由是罪恶的，有害的，社会主义必须把它消灭干净，然后另起炉灶，建造一种全然不同的自由呢？这种自由，应该逐步扩大呢，还是不断缩小？从我国的历史看，远的不说，林彪、“四人帮”所完成的历史使命，就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扼杀一切自由。从苏联的历史看，十月革命后列宁时代曾有过较大的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后因强敌入侵和国内外阶级斗争剧烈化而暂时缩小，斯大林当政后又以“阶级斗争随社会主义发展而日趋激化”的理论进一步缩小了自由。斯大林逝世后，又开始了一个相反的进程，自由逐渐扩大了。

当然，在我国，自由的问题有着比“自由化”更久远的历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有一句唱遍全中国的歌词：“建设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奇怪得很，大陆一解放，“自由”（后来连“幸福”在内）这个词便从我们的语言中消失了。就我记忆，似乎只有在批判“自由主义”和“资产阶

级自由民主思想”或批判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之虚伪性时方能碰到这个词。至于文学创作界，则好象从来都是创作自由太多了，不然就不会从《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武训传》到《海瑞罢官》十六年间不断出现危及党和社会主义安全的大小毒草，不至烦劳大小理论权威从作品的服务对象、描写对象、主题、题材、创作方法、表现手段等各个方面费尽心机地作出各种限制了。或者，反过来说，又似乎创作并不需要什么自由，不然一九七八年以后，当文学稍微触动一下祸国殃民十年之久的大灾难时，为什么便有人大惊失色；一九七九年几位作家在四次文代会期间说了几句实话，为什么又有人义愤填膺地大叫“右派翻天”呢？

我不是理论家，既不能高瞻远瞩，又才疏学浅，只能从近几年个人的狭小天地里看问题，看来看去，明白了一点点：自由确可分为有害和有益的两种。以权谋私、失职渎职、贪赃枉法的自由，无疑是有害的了，反对这种自由的自由，自然应该是有益的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后一种自由享有的氧气总是不如前一种多，而那种十分自由的自由，又无以名之。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吗？

十二月二十九日

大会正式开幕。这是一个历史的日子。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祝辞中，文学界将永记不忘的可能是这一段话："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劳动的成果，具有显著的作家个人特色，必须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必须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必须有独特的艺术技巧。因此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就是说，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感染力的能够起教育作用的作品。列宁说过，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

这段话表明，党中央是了解和尊重艺术的特性，相信作家，并且充分总结了几十年来的经验的。这是继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同志对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之后，中央在创作自由问题上指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必将是今后实现文艺创作大繁荣的一个根本保证。

很多老作家这时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辛酸的回忆和对美好前景的向往交织在一起。

青年女作家陈愉庆担当起贺电、贺信和贺诗的朗诵人。掌声的分配，很不均衡。周扬同志从病床上打来的祝贺大会成功的电话，寥寥十几个字，引起全场雷鸣般的掌声，持续近五分钟。大家都明白这掌声的几重含义。

五十年代，我很少参加文艺界的活动，记得只听过周扬一次讲话。真正了解他，是在一九七八年以后。那时我在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他就在我们楼上办公。听说，凡国外进口的新的哲学、美学与文学理论书籍，他都要图书馆先送他浏览一遍。继之，又听说他在广州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向当年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一一道歉。一九七九年三月，我参加了《文艺报》主办的一次文艺理论讨论会。最后，由周扬作报告。想不到他在讲话开头又一次逐一点名向首都文艺界被错划为右派的人道歉，更使我惊讶的是他还说出了我的名字！一九五七年，我并非文艺界人，被划为右派同他老人家毫无关系嘛。他同时还表示要找我谈谈，不久，果然在他办公室作了第一次谈话。

这件事，和我听到的另一个情况——当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陈荒煤同志在大江南北多处发表演讲，猛烈批判"左"的思想对中国文艺的危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我对于过去执

行过“左”的政策的文艺界领导人和理论家的言行就比较注意了：他们认识了过去的错误吗？他们有改正的表示吗？

一年以后，在北京饭店与聂华苓谈话时，我就第一次作了周扬的辩护人。从此，对海外和国内不明真相的朋友，我多次举出两点，证明周扬同志尽管过去犯过“左”的错误，但确是大彻大悟了：一、他敢公开承认错误；二、无论刮什么风，他的调子始终不变，未见摇摆。这两点都是很难得的。记得八一年初文联在北京饭店举行的迎春茶会上，由周扬代表文联讲话。那时，气候已经不大便于畅所欲言了。我都有点替周扬感到为难；能说什么呢？出乎意料，他讲得很好。他首先说，我们应该爱护人才，中国不是人才太多而是太少了。第二点，他讲作家要有勇气，既要勇于批评官僚主义，也要勇于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一面听，心里一面叫好，敬佩这位老人——他仍然没有变调子，没有说违心之言。这是在那种气候下所能发表的最好的言论了。

一九八三年三月，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发表时，我在空军招待所采访朱伯儒。我水平不高，没看出那里面有什么问题，倒觉得有些可贵的和大胆的创见。周围的人也抱同感。

今夏，他访日以前，我到北京医院探视他，觉得他的健康状况并不象有些朋友说的那么坏。我最担心他患老年痴呆症，所以谈话间特别注意他的反应能力。很好，听觉也不错，只是腿脚明显地不如过去灵活了。在这次大会上，听张僖同志说，他从广州归来时，健康状况仍然不坏。据说病情的剧烈恶化是同两位客人会面和谈话之后发生的。

今天大会上这一片掌声，无异于一次民意测验，也是对一个人做出的最公正的评价。那位老人应该感到快慰罢，我想。

另一位老人，文坛前辈谢冰心同志从病床上写来的贺信，也令人感奋。她对近几年中国文学创作的成就估价极高，字里行间，也可以感觉到她为“许许多多年轻的文坛新星”的出现，和巴金同志一样感到由衷的“光荣而自豪”。我尤其喜欢她的这句话：“凡是有利于文艺界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我一定拼命干，不利的，不干，坚决不干！”

老作家中最受人敬仰的巴金同志未能到会，大家都深感遗憾。他在由唐达成同志代读的大会开幕词中，谈到五年来文学界的变化和成就时强调指出：“中青年作家已经成为我国文学界最活跃的因素”，他们“在思想上、艺术上勇于思考，敢

于探索，能够较好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他还说："伟大时代产生伟大的作品……我们更需要史诗般的杰作……与人类最优秀的文学名著可以媲美的精品。我们曾经梦寐以求，渴望早日出现当代的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出现中国的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这历史的重任就落在我们中国作家、特别是年青一代作家的肩上。"

巴老结尾的几句话，语重心长，也许只有了解中国和上海文学界内情的人才能领会其中的含义："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相比之下，其他一些是非得失也就微不足道了。我想，作家的名字应该和作品联系在一起……如果大家全神贯注，聚精会神从事创作……那么对于促进我们文学界的大团结、大繁荣也是大有好处的。"

然而，如果不呢？对自己也没有好处。

夏衍同志没有念中国文联给大会的贺词，而是讲了自己的话。我不由得回想起四次文代会夏老致闭幕词时的情景。闭幕词嘛，无非是官样文章罢，想不到竟是一次感情真挚、思想深刻、充满新意并且相当大胆的一次讲话，为整个大会画龙点睛，余音不绝。

我常说中国人较易衰老——不是指身体，而是指精神和感情，然而夏老就是一个例外，八十

余岁高龄了，感觉之锐敏、思维之清晰和精神之雄健，我看是超过了某些中青年。

这段话引起的共鸣是强烈的："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近年来，没有搞过运动，也没有打过棍子，但是，念紧箍咒，'鸣鞭'吓人，制造山雨欲来的紧张空气，乃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的。文艺界要大团结、大繁荣，上述的这些'文革遗风'就必须及早清除……"

夏老号召："要解放思想，志强学广，文艺工作者要下决心认真学习。"说得真好，不知别人怎样，反正对我很合适。我恨不得放弃一切，钻到山洞里读完我办公室地上那二十箱书……

下午，张光年同志作报告。在几年来文艺界和不仅是文艺界的风风雨雨中，光年所表现的坚定与勇气，以及他对于中国文学界之能有今天所起的作用，在首都作家中也不是所有人都了解的，得知其详的人就更少了。

十二月三十日

上午乔石同志作报告时，有人递了一个条子：有的地方对干部四化问题提出：革命化是主要的，其他三化是次要的。这对吗？

这种提法很有趣。人生很多事，你千万不能

从字面上去理解。比如那些主张以“革命化”为主的人，即使不怀他意，那个“革命”的意思也很值得推敲，至少在他看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不要知识和专业也是可以革命，甚至还革得更好呢。那么他要革的是什么命呢？

晚间，各代表团讨论理事会候选人名单，都有所增补。也有撤掉原候选人的，如上海和湖北。在党中央的鼓舞下，人们开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了。

到诗人满锐的房间里闲聊，又谈起干部问题。满锐和王毅（《笨人王老大》的作者之一）都对现在选拔干部的配置第三梯队的标准感到忧虑。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来，我几乎忘记她就是三年前曾一起长谈过的那个人。她知道谈话时间有限，写了一个稿子让我先看再谈。她听过我在《文艺报》举办的讲座上的演讲，对于我对中国前途的乐观表示怀疑。于是我便大讲一通乐观的理由，并一一回答她的反问。老天爷！这至少是我对今年遇到的第三位女性谈同一个话题了。而在某些同志眼里，我却是一个坚持“反党”立场不改，至少情绪很不对头，甚至“以他现在写的东西就可以划为右派”的人呢。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讨论胡启立同志祝辞。老诗人刘雪苇同志说起一些历史情况，对大家很有启发。他说，文艺创作自由问题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出，就他记忆最早是在一九三六年，一直没有解决。从一开始，它就是个革命文学内部的问题，那是在香港，是胡愈之和茅盾提出来的，曾引起一场大讨论，无结果而告终。问题的提出，目标在批评家和理论家，实则针对代表党在文学界居领导地位的人。主张创作自由，反对过多干涉的人，常被扣以“托派”、“汉奸”的帽子。解放后，党执政了，可以实行行政命令和行政处理，就更厉害了。思想上，是“左”的机械论和教条主义的框框套套，组织上就是一批批帽子和组织处理。不管作家是否同意，非照办照写不可。“所以，创作自由问题实质上是文艺工作的方针路线问题，是领导的问题。”刘雪苇同志说，“不能把作家写作过程中主观上自由不自由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个问题确有，如果戈理写《死魂灵》第二部写不下去以至焚毁文稿那种情况，那是作家感性与理性分裂的问题。我们过去‘赶任务’写的作品，现在还有几部人们记得的？年轻作家一篇处女作一举成名，后来就写不出好作品，被人遗忘了。这都属于另一种性质的

问题，应由作家自己去解决。”他说，现在中央解决了这个文艺路线问题，下一步就是如何贯彻了。领导班子，特别是作协的党组，很重要。应该在大批“左”倾机械论思想和“左”的组织路线、行政命令领导方式之后，经过民主选举重新建立。他分析“左”倾组织路线的三种表现：一是喜欢吹捧和迎合自己的人，重用恭顺和带有奴性的人；二、以个人好恶定亲疏，即以我划线；三、凡善于独立思考、对领导持监督态度者，就打击，压制，埋没。

我第一次见到诗人鲁藜。他站着发言，有人劝他坐下。天津的同志了解他，说让他站着讲好了，不站着他就讲不好。果然，发言一分钟以后，他感情就奔放起来，不停地挥手，走动……他是接着刘老发言的最后一部分讲的，雪苇同志讲到他因胡风事件和“文革”期间被天津“八一八”定为叛徒，先后坐牢二十四年。鲁藜说，他这个“胡风分子”根本没见过胡风，只因在延安写过一首诗，还是《延安赞》，经人推荐给胡风主编的《七月》发表，遂定为“胡风集团分子”，干了二十六年重体力劳动。“文革”期间，又因和江青在上海一起工作过，遭到迫害。一九八〇年五月才给他落实政策。一九七六年起他重新写诗，已写了二百余首，出了两本诗集。他说，这次是他三十

年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走进会场时感慨万千。谈到开幕式上的掌声，他激动地说："作家言必由衷。我要写一首诗。(那次读贺电贺信时代表们)对有些人的沉默，就是最大的批评。"

著名女作家柳溪同志，是和我有过相同遭遇的人，我也是久闻其名，初次见面。原来她也和鲁藜同志一样，落实政策比我要晚，所以也错过了七九年那次大会。

青年女作家航鹰，也是初见，原来名实不副，形象并不可怕，倒显得相当温厚平和。记不得是谁，在会上说了一句：柳溪那一代人付出的代价，为航鹰这一代年轻人铺了路。言之有理，今天我们获得的一切，难道不都是几代人在不同条件下以不同方式付出代价以至牺牲换得的果实吗？

下午，主席团开会讨论理事会候选人名单。由于各代表团增补的人数总和超过了原定差额25%，要求各代表团削减一二人。

在讨论中，发生了不同意见。按民主程序，对有争议者以举手表决取舍。

从传达胡耀邦同志讲话到胡启立同志发表祝词，保证作家创作自由的提出在代表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普遍地喜出望外，人们私下间、各代表团会上会下，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部队代表丁洪忆起一九六六年部队文艺工作

者曾在京西宾馆“看电影，批黑线”，对照今日，感慨万千，在讨论会上即席赋诗《相见欢》：“别来已是十八年，忆犹鲜：地暗天昏人鬼是非颠。春已到，人皆笑，好心欢；且把那些往事当云烟。”

辽宁青年作家金河谈到自己的体会：“世界上没有哪一部传世的杰作，是在人为的框子里创作出来的。但是过去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一讲‘创作自由’似乎就是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似乎作家们天生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怪气体，必须用一个密封的罐子装起来，不然就会放毒，甚至爆炸。这是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和对自己缺乏信心的表现。人不能带着手铐跳舞，但去掉手铐是为了能跳出更优美的舞蹈来。胡启立同志说的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创作活动要和创作自由的环境合拍，我理解就是作家的愿望同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

很多代表认为，这次大会带来了文艺的春天，但也不能过于乐观。必须纠正“左”的偏向，才能保证创作自由，才能实现大团结和大繁荣。如何反“左”，就成了一个比较集中的讨论的题目。

浙江代表高光说：“高兴之余还有点担心，担心会议的精神向下贯彻还会有困难。‘左’的东西根深蒂固。《江南》共发了五六十篇作品，‘清污’时竟说三十多篇有问题，五个编委全被撤，编辑也

只余下一二人。"江苏代表陆文夫说："人家反'右'有很多办法，一套一套的，什么表态、造舆论、大批判开路、整材料、组织处理等等。当然，我们反'左'不能照此办理，但是究竟应该怎么反，我觉得应该研究一下。"艾煊说："发表一些观点'左'点的文章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领导人'左'，就会逼出人命来。因此，'左'与权力一结合，就不得了。"一位文艺理论家也说，"我们'左'的背后有'门'"，宣传领导机关也要总结教训。

一九八五年

一月一日

一九八五年的第一天，但愿年年都在这样的喜庆心情和气氛中度过一个元旦！

这一年是属于我的——它是牛年。据说美国的一头牛聂华苓已经与上海的牛茹志鹃签订协议，要合写一部长篇小说。牛是善良、坚忍与勤劳的象征。愿在这新的一年里，胡启立同志祝词中所说的那第三个问题——中国作家间互不团结的现象能在宽容精神下消除，一致同“左”的流毒作坚韧的斗争，致力于辛勤的耕耘。

一月二日

大会发言。谷斯范同志以《冲破“左”的龙门》为题发言，回顾了浙江省文艺界领导由于“左”的思想恶性膨胀，对作家民主权利的严重践踏。以作协浙江分会名义下达的文件《关于改革专业作

家制度，设立文学创作员聘任制度的草案》，是在未经会员讨论、分会主席和副主席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付诸实施的，结果排斥了该省仅有的四名专业作家。推选本次大会代表和下届理事候选人，也采取了违反民主的作法。

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分组讨论会上，北京市代表刘厚明就胡耀邦同志关于作协的选举必须民主的谈话，提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党怎样领导群众团体的问题。中国作协是不是群众的团体呢？有人说是半官方的，实际成了中宣部上传下达机构。

中直代表蒋和森说：为什么要把作协搞成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作协是一个群众团体，不是政治协商会，在人的安排上不需要这么多的照顾。作协代表大会本应讨论理论上、创作上的问题，而这次大会好象是要选举一个官僚机构。

的确，一个群众团体，行使领导权力的，到底应该是会员选出的领导机构呢，或是上级党的机关随时可以派出、也随时可以撤换的党组呢？长期以来，实际上是党组说了算。这还能有什么民主？不改变这种状况，甘肃省与浙江省文联和作协中发生的事就会永无休止的继续发生下去。党中央是信赖作家的，那么大的创作自由都交给作家了，不会继续让某级党委委派的几个人来主

宰作家的命运吧？

各省的情况是很不平衡的。江苏的作家群敢于运用自己的权利抵制“左”的压力，文艺创作就比较繁荣，刊物办得也好。有人说，艺术发展的水平是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各省区之间文艺发展状况与作家地位的不平衡，至少反映了那里领导的水平。贵州省经济水平不高，但从那个省推举新起的青年作家何士光为全国政协委员；另一省却撤掉了政协委员中所有作家，可以猜想到两省其他方面的差距。

明天就要选举下一届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几天来，这是代表们最关心的大事。理事会二百多人，是不是太大了？缩小理事会，扩大顾问名额如何？怎样使中青年作家在未来的作协领导机构中占相当比重？如何使代表们能够真正行使民主权利？……

和过去一样，代表们不了解很多候选人的情况，甚至政治上关系至大的问题。对另一些同志近年来为抵制“左”的压力、繁荣创作所作出的可贵的努力，不少代表也不甚了然。这对于选举中真正行使民主权利自然是一大障碍。当然，这也不是作协代表大会特有的问题。看来，什么东西都得配套才行。无记名选举，无疑是一大进步，但从一张选票如何产生，从选举人拿到一张选票

到投进这张选票这个过程，还是很有讲究的。怎样使选举人对候选人名单上那三百来位人士有所了解？民主链条上的这个环节，资产阶级那一套我们不能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我们又尚未铸造出来。

晚间，随同刘真和铁凝去访问寄居北京的工程师武宝信。他是铁凝的报告文学《美从东方来》中的主人公，即那匹几乎被宰掉的千里马。铁凝难辞其咎，因为她若不写这篇作品，或者她若把伯乐而不是千里马作为主要人物来写，就不至使那匹千里马在为本厂创造几百万元的财富之后，有厂归不得了。

一月三日

前几天各代表团调整理事会候选人名单时，上海市代表团增补的新候选人也多了些，后来按主席团的要求，减掉二名。代表团负责人委托两位老作家分头告知这两位代表。这不是个喜庆消息，传递这种消息不是个愉快的差事，故一位老作家就没有去告知一位已被从候选人名单中拿掉的代表，从而被取消资格的就只有一位了。这位同志感到不平，难过，我也同情。

忽然，第二天下午，他的名字又出现在候选人名单上，他和我都先是感到惊异，后来便以为

一定是上海代表团又改变了初衷。这当然最好不过。想不到今早开会前的一刻，拿到大大的一张粉红色选票时，上边有一个候选人的名字被用毛笔勾掉了。按顺序看，正是那位同志。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赶忙去找大会党组负责人，回答是：新的候选人名单和选票上印上此人名字，属于工作人员的技术性失误。"既然已经印到选票上去了，为什么非抹掉不可呢？这是对一个人的侮辱呀！"上海代表团负责人否认他们曾坚持要求更改选票。我这时过于激动，没能控制住小布尔乔亚情绪。

晨九时，举行理事会选举，这也是大会的最后一幕了。我今天是大会执行主席之一。另一位执行主席胡采同志宣布今天只有一个议程：投票选举。我吃了一惊，赶忙去问：昨天大会主席团开会不是决定选举后继续大会发言吗？据说是考虑到投票后代表可能纷纷退场。发言效果会受到影响。好，那就取消发言吧。选票使我发生一点疑问，跑到台下，找不到我要找的人，只好又回到原位，在三百来名候选人中进行选择，画圈。然后，投票。代表已有三分之一以上退场了，忽然宣布：继续大会发言！我不禁又吃了一惊。

无论选票上的问题或大会议程的这两次变动，执行主席竟都一无所知，却又不是哪个人的

恶意造成的。无非是我们尚不懂得、也尚未学会尊重民主程序而已。一句话，大家彼此彼此，对于民主还不大习惯。

我发言了。我从选票的涂改谈起，说到日常工作中缺乏民主作风的问题。我心里明白，有人又会不习惯，对于不同的意见以至公开的批评，不大习惯，不大高兴。然而多年新闻工作，特别是去年三下西安采访，使我深深体会到：没有一定的公开，也就不会有一定的民主；把不该隐蔽的事情隐蔽起来，结果只能使我们自己受害。我想，即使是由于动了感情而稍嫌激烈的批评，也比不批评要好。大家还是习惯一下吧。

我讲到创作自由，我说这不仅是一个关系到文学成果大小的问题。创作自由是决定文学生死存亡的生命线。胡启立同志是在阐述了文艺这种精神劳动的特点之后引出“因此，创作应该自由”这个结论的。“四人帮”的十年“大试验”证明，在最严酷的法西斯统治下，工业、农业、科研也仍然或多或少有些收成,唯独文学是绝对的绝收，是一片不毛之地。这个事实从反面印证了中央祝词中作出的论断。

如果把张光年同志报告中总结的五年来文学创作在主题、题材以及表现方法方面的发展与突破，好作品与新作家的大量涌现比喻为一个躯体

从瘦弱发展为丰满健美的话，那么在肌肤之下还另有一个重大变化发生。试切开一块肌肉，看看它的断层，检视一下神经和血管，就会发现那里增添了一种新质，即批判精神。我们历来把文学的批判功能当作资本主义时代文学的专有物。我们习惯于把批判看作只能用之于敌人的武器（只有中国的语言里批判和批评是分开的）。其实资产阶级从它的自我批判和敌对力量的批判中都捞到了莫大的实惠。我们自己，几十年来任何一次失误或历史悲剧都不是因批评或批判过多而造成的，往往是恰好相反。可见，批判精神并不是坏东西；批判和歌颂一样，无非是一种手段。错误的（过分的）歌颂未必有利，正确的批判未必有害。文学天然地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与内容，这并不妨碍它赞美和歌颂真善美，反而使这种赞美与歌颂具有更大的说服力与感染力。正由于此，启立同志在祝词中才说到"我们的作家要努力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反映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劳动与斗争，理想和追求，成功和挫折，欢乐和痛苦，反映四化建设的沸腾生活，塑造勇于创新、积极改革、为四化献身的新人形象，鞭挞消极的、腐朽的思想和社会现象。以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教育人民。"

吴祖光同志作了一次很好的发言。他说："这

么多年来，我们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终于换来了今天。党中央明确提出要保障我们的创作自由，这是我们党强大和富于自信的表现。抗战时期我们写戏，国民党老是说戏里的好人是共产党，坏人写的就是他。那时我就认定：'这个政权是完蛋了！'害怕批判的东西，动不动就说是'抹黑'，这是衰弱而非强大的表现。"他说："我认为，不懂得文艺的外行来领导文艺工作，当然会做出很多不合适的事；但有的时候更可怕的是，懂得文艺的甚至他本人就是作家、艺术家的同志，担任了领导工作，他干的那些坏事，要比外行作领导的可怕得多！棍子捏在手里，想打谁就打谁。今天，我们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已经满意得过头了。问题是：几十年来一贯坚持极左路线的同志，今天他们应当说话。思想不是那么容易转变的，一下子就跟我们完全一致了吗？"

浙江的一位代表（还代表另一位代表）发言，历数了浙江省作协分会的成绩。最后，他说谷斯范同志一月二日的发言有些情况与事实不符，要求进行调查。

这时，下边递上一个条子，请发言人回答：《江南》杂志的主编高光同志是怎样被撤职的？我把条子递交给他。他看了看，不予理睬就退席了。

一月四日

由著名作家张贤亮发起，今晚举行舞会，感谢大会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确实很辛苦，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凌晨。他们为这次大会的成功作出重要贡献。我也喜欢跳舞，可惜缺乏勇气，故主要是观战，对勇敢而坚韧不拔的张贤亮羡慕不已。可以自慰的是我倒和一位工作人员跳了半场舞，张贤亮倒许是忘记今晚舞会的主题了。我喜欢张贤亮，包括他舞迷的一面。比起某些人来，他真挚和坦诚得多(且不说他的魅人的才能)，虚伪与怯懦对于一个作家是致命的伤残。

一月五日

昨日会后，有几位同志为我惋惜，说我应在投票之前发言。初听好象在理，继而一想，那就糟了，因为必定有人会说：刘宾雁发表蛊惑性演说，目的在于拉选票。现在，除非记忆力很差的人，是不会把我的发言同我得票的数目连在一起的。

看来大家对于选举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理事会中，新人占58%。主席团中，六十岁以下的人占40%，最年轻的只有三十二岁。理事会里，五十五岁以下的人占38%。比起前一届来，更年轻化了。

这次大会，对创作问题讨论不多，是个遗憾。会期本来不长，又有好几个报告，时间就不多了。有些代表以为大会发言是内部安排的，故未报名。

报告，我只听了最感兴趣的一个。笔记本打开了、钢笔帽也打开了，却一字未记。那位同志的报告完全可以拿到报纸上发表，一字都不必改动。他忘记了台下坐着的是一千多名作家吗？

一月九日

在全国记协俱乐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国际舆论界对这次大会都很注目，据说七家主要通讯社都发了报道，这些通讯社各有几千至一万余家订户。

作协党组书记和书记处常务书记唐达成同志向二百余名中外记者介绍了大会总的情况以后，我们分散到各个房间里分别会见记者。我和《文艺报》总编辑谢永旺同志这个房间里，大约有四五十位记者。听听他们的问题是很有意思的。“过去，中国的文艺政策多变，怎能保证今后不收回创作自由呢？”“什么条件能使创作自由在各地真正实现？”“中国的作家和诗人有无因创作而入狱的？”“这次大会上持有‘左’的思想者是不是发表了反对意见？”“为何不按得票多少顺序安排作协的主席、副主席？”“巴金说中国迄今尚未出现当代世

界水平的作家,你认为前景如何?”“你认为中国会不会再发生一次‘文化大革命’?”“你说不会,太绝对了吧?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吗?”“中国会不会允许反对政府的作家存在?”……

我们一一作了回答,态度是诚恳的,看来他们还满意。关于我个人,有几个这样的问题:

问:你没有参加最近召开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会议,我们都感到吃惊,这是为什么?

答:我一点也不感到吃惊。

问:听说你在大会上发言很精采,能介绍一下吗?

答:你的消息倒挺灵通呢。我在大会上谈了我对创作自由和文学的特殊社会功能的看法……

问:听说你的作品常引起麻烦,告你的状,你是怎样处理的?

答:毫无道理的,我不加理睬。最近有一位精神病人写了许多信向中央各机关告我,精神病患者是可以不追究诬告责任的。以党委名义告我,又是重大分歧,我就得说明情况和进行辩论了。有一年我为此耗费了三个月时间。真正是我错了的,我检讨。

问:听说你关于西安的报道挨了批评,是吗?你还能再写吗?

答:你既然知道了,就无须保密了。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批评西安的报道:题目是《中国有个唐安华》,就发表在《三月风》杂志的创刊号上,刚刚出版,欢迎你找来看看。

一月十三日

《参考资料》今日上午版刊载了外电关于一月九日中国作协主席团记者招待会的几则报道。

关于我的谈话，做了相当大的加工。我重述了大会发言中的一个论点：五年来我国文学创作中一个重要变化，是作品中对社会现象的批判精神增强了。不料在记者笔下"过去式"变成"未来式"，说"刘宾雁呼吁"如何如何，这当然改变了我的本意。关于领导人过去和将来对一部作品发表意见会不会影响作品与作家命运的问题，报道也改变了我的意思。

从那天招待会上记者提问的情况看，他们似乎并无恶意。象我在国外经历过的类似场面一样，没有人提出一个刁难性或挑衅性的问题。也许显得有些奇怪：他们担心的也是文学创作自由的方针能不能顺利实现，以及中国会不会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之类的问题。这个现象，也许可以归之于"从不同立场出发，有时可在某一点上汇合"这个原理吧？不然，两种社会制度、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之间也就不会有会谈、协议、合作与交流之类的活动了。

中国人很重视印在纸上的铅字。但愿今后有条件读到外电的中国人不至过于认真，把外国记

者关于中国人谈话的报道都看作谈话者心声的准确记录。他们有他们的需要，总要把事情朝他们报纸或通讯社的订户最感兴趣的方面渲染和突出，何况"耸人听闻"已是他们的职业习惯了呢。只有极个别的外国记者才给被访问者审稿，他们似乎没有这个习惯。

其实，印出来的铅字，在外国读者中产生的效果和我们的设想也并不一样，因为，那些读者并不象中国读者那么认真，他们对新闻报道的感受方式不同。比如，他们并不认为一个公民、一个作家说的话就代表一国政府或一个执政党；并不认为一个社会里人们有不同意见是坏事，会导致天下大乱；甚至认为这是那里有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表现。特别是作家，在他们看来，社会有分工，而作家这种职业决定他在现代社会中占有一种特殊地位，和政府官员大不相同。作家是人民总体的代言人，他观察世界、写作和发表言论的立脚点同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的政府官员有所不同，乃是情理之中的事。他们不认为作家的平庸和驯顺是对一个社会有益的事，他们不能设想，一个作家可以没有自己的头脑，可以没有一点批判精神。

持敌对态度的记者或面目全非的歪曲宣传，情况就不同了。于是，我又想起美国记者包德甫那本《苦海余生》。当我在美国公开批评这本书严重

歪曲了中国的真实情况、一个严肃的有良心的记者不应该对于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变的过程视而不见时，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你也要考虑一下包德甫在中国活动的条件。中国人里什么人最爱和外国人接近呢？他接触最多的恐怕是不大正经的青年，你想他能听到多少有关中国生活主流的情况和正面的信息？正经的中国人若能多见见外国记者就好了。"听了也觉得不无道理。这位朋友还建议我把几天前的《华盛顿邮报》找来看看，说包德甫在那里用整版篇幅发表了一篇揭露波士顿市长劣迹的报道。我没有找到那张报纸，但他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他是说：美国记者不光是批评你们。我们这里干记者这一行的，就是这样……

那次记者招待会，我还是相信我们留给外国记者的，绝不仅仅是他们写下来和发出去的那些电稿。以诚恳的态度介绍的真实情况，总会增进他们对中国现实的正确理解，只有死心塌地的敌对分子应该除外。但要求那些在全然不同的环境中成长起来、观点和感情与我们不同而又有特殊职业需要的人，说出的话和我们一样，恐怕就不现实了。

一月十五日

十分意外又非常高兴地收到曹天予、林春夫妇从英国写来的短简。天予走后，知道他们夫妇感情很深，我还很为他们一别数年的寂寞难过一阵子。不久前听说林春也去了，感到分外欣慰。又为自己近几年很少见到他们、失去长谈机会而惆怅了。

林春写的是："我十月六日离开北京到剑桥来学习……我的专业是政治思想史，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史观史。我的导师叫 Sfedman Jones，据我看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我现在的主要困难是克服语言障碍。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您（在社科院），您说一定要掌握外语，我要是从那时开始努力就好了……来以前听说了不少关于您的事情，不知近况如何？十分惦念。我和我的好多朋友，我们都希望象您这样的人多一些。我们在这里订《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希望看到您更多的文字。还希望多多保重！……"

天予附笔："听说国内变化很大，真盼望能见到您，听听您的分析与评论！……一转眼五年过去了，但七九年二月初次相见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三月十八日我收您的《情况》（指我一九七九年为

改变他的命运为《中国青年报》写的《青运动态》——作者注），泪如泉涌……”

那是我蛰居二十二年后的第一次采访，偏偏又是在因一九五七年最后一次采访而出事的上海！曹天予还戴着一九六四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定为“反动学生”劳教、劳改多年，在上海被扣上的“现行反革命”的双重帽子。他初中三年级便读完上海图书馆“五四”以来文学作品的全部藏书，因拟办“同人刊物”而险些被定为右派。搞文学不行了，他就自学美学，关于黑格尔美学的论文得到京、沪美学家赏识。一九六二年第三次参加高考，趁那短暂的阶级斗争松弛的间隙，他考取了第一志愿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多后，就被打成“反动学生”（那是一次全国范围的高等院校中一次小的反右派运动），美学和哲学都搞不成了，他又在劳改场里攻读高能物理。因重病回上海保外就医后，兄妹两人天天必须偷偷躲过弄堂里民间治安人员的监视，借他人的工作证提心吊胆地跑图书馆冒险阅读于任何人都无害的物理学。那情景可称二十世纪奇观之一，很值得一写。当然，尽管如此艰险（家里生计还成问题呢，全靠患高血压的老母的退休金维持），妹妹曹南薇还是考中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现在也出国深造去了，这就是以前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了。哥哥却不那么幸

运。当年主持把他打成“反动学生”的人，并不反悔。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冲击。考了研究生，不被承认；几个研究所欢迎他去，却去不成。结果，直到他年逾四十，娶妻生子，仍然既不是学者，也不是学生，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工作人员，全靠林春一人菲薄的收入养家糊口。国外倒有三家大学请他去读博士研究生。曹天予和妻子感情很深，对于长期离别曾踌躇良久，也征询过我的意见。我也只好主张他出去，然后以博士的身份归来取得一张中国的工作人员证。

不过，也可以相信，在中国知识分子受难者中，曹天予应该是最后一代了。应该为他们夫妇高兴，因为毕竟双双取得出国深造的机会。

一月十六日

参加纪念一位古人，还是外国古人的集会，实在抽不出时间，无奈王歌催得太紧也太诚挚，只好去了。想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主办的这次茹尔·瓦莱斯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却开得意外地成功。

沈大力同志的讲演《贫贱者的文豪》介绍了这位巴黎公社战士、革命作家坎坷而光荣的一生。关于瓦莱斯致力于文学改革的一段，听来颇感新鲜：“他反对循规蹈矩，不师法任何巨匠、任何流

派，一意创新……首先，他勇敢地向被誉为法兰西文化精粹的经典修辞学挑战；远在玛·普鲁斯特之前，他就突破了统治整个十九世纪文坛的巴尔扎克模式……他摆脱了巴氏小说的时空观，不再采用那种传统的纵览全景、由表及里的客观描绘，也无意求助于福楼拜的心理分析，而是随心所欲地横断环境，选取人们感受最深的瞬间，用内心独白，甚至在人物对话中道出尾白，省略一方接话，把对话变成一种单独说白，来强烈表露主观情怀，形成一阵阵、一股股'精神脉冲'，即后人逐渐明确的'意识流'。

"瓦莱斯独特的'即兴风格'在于：一切均由作品的主人公去发现；一切场景、人物和事态变化都充满主人公的思想感情，通过火山熔岩般的语言喷发出来……"

哦，原来"资产阶级现代派"文学的鼻祖里，还有这么一位无论怎样苛刻的批评家也划不到"资产阶级"里去的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有意思。

苏姗娜·贝尔纳女士，我是第二次见面了，她的发言也和沈大力一样，没有一句空话、套话、大话和废话；完全是用她自己的语言表达她自己的思想，还十分精炼。我很欣赏苏姗娜的这些思想："瓦莱斯对人类的爱，对人类的信心是绝对的。

他尊重他人，尊重差异，充满自由感。他主张观察的自由，批评的自由。人人有权自由思考，自由幻想，自由讨论，不唯唯诺诺。每个人都有责任感，都有清醒的意识。自由是人类之友，能够让每个人寻求自己的道路，从而求得自身的发展。巴黎公社就是对一个光明和自由的世界的渴望，在那个世界里，人们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畅想和建设。

“瓦莱斯拒绝任何教条，不遵循任何成规，不接受任何僵化的思想和折衷的协议。他总是处在奔放、运动和勇敢探求之中，因而曾经象征过、而且至今仍象征着未来。”

听着他的讲话，我的思想不时飞向巴黎街头。瓦莱斯身上确实体现着法兰西民族性格中最优秀的东西。

瓦莱斯绝不会想到九十余年后中国会有人借用巴黎公社的旗号推行法西斯专政吧。

那正是舞台上高喊瓦莱斯为之献身的革命和瓦莱斯没有想到的纯洁，而生活中绝无瓦莱斯讴歌过的自由和爱的时代，那些宣传家和理论家们对于维持可疑的“纯洁”和扼杀真正的自由是下定同样的决心的。为此目的，那个迟群不就叫嚷过“中国应该退回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吗？也确有肯于接受这种蛊惑和欺骗的人们，而这又是因为

关于一贫如洗、清心寡欲才是革命和纯洁这个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的原故。

然而，当我们在这里纪念瓦莱斯之时，窗外方圆几十里内，恐怕还有人满怀柔情地留恋着一九六二——一九六六那个年代呢。

一月十七日

三位女士到我家来，为一位并无私交的男士在婚姻问题上遭到的不幸和灾难倾诉不平。又是一个“陈士美”！“陈士美”简直成了中国的土特产。

我的感叹并不是一时冲动。这个余××若不是一个多才的博士研究生，就不会成为“陈士美”。看来，不仅写小说会为一时政治需要而把生活塞进一个既定的框子里去，有的司法和舆论机关也在进行这样的创造活动呢。

故事也很简单：一个一贯勤奋学习、工作，主持和参加过几个科研项目，受到市和中央部的奖励和得过科技成果二等奖并多次被评为先进科技工作者，取得硕士学位后又成为中国首批博士研究生的人，在即将取得学位时突然身陷囹圄。原因是夫妇不和。

最初，罪名是“虐待罪”，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逮捕，判刑一年半。双方不服。进一步查证，

没有查到新的事实，倒查清了没有虐待罪，还查明女方有一些错误行为，区法院重新开庭，审判长在法庭上回答律师“本庭只审理虐待罪，不审理他案”，可是后来却突然改判余××为伤害罪，有期徒刑三年。那时，该市正开展“保护妇女儿童月”活动。

丈夫确实打过妻子，但妻子也不断打过丈夫，还虐待亲生女儿，女儿还把她母亲给告了呢。妻子四处散布和指控丈夫不忠，与一女性“长期通奸”，而那位妇女经查还是处女，这位妻子却在离婚前很早就在向多人求爱了。

余××在申诉书中写道：“……二年多前的家庭民事纠纷上升为刑事案件。剥夺我的反诉权利。我不愿相信区法院和中级法院某负责人与杨××有什么默契，更不愿相信法院的负责人会以权谋私。但一年多来诉讼过程和判决结果，与杨××所宣称的要毁掉我的一切，竟是如此地一致！”

一个公安人员说：“因为你是知识分子，你是博士研究生，所以要抓住你做典型，严惩你。”余××不能不相信此说有一定道理，因为一个无业的、因盗窃先后两次被劳教过的人，真正犯了伤害罪，只判处拘役六个月。

这是找到我家门上来的第五起情节相似的婚姻案件了。一九八一年我采访的中国医科院研究

生陶海南，就是以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考取研究生后抛弃发妻等罪名而在毕业前夕被取消研究生资格的，中央科技干部局和记者早已查明夫妻关系的破裂早在新婚之初，与研究生身份无关，但仍然被搞得声名狼藉，至今不能恢复名誉。

托尔斯泰的原理须要加点修正了：不幸的家庭也有彼此十分相似的。五起案件有一个共同特点：最初，女方也许还并不愿家庭破裂，但后来则下定决心不计一切非把男方搞垮不可，根本无意重新和好了。受到损失的则不仅是一个家庭，还包括男方为之献身的事业。

妇女在许多事情上天然地处于不利地位，应该同情。但现在看来，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至少从这五个案件看来，男人未必经常是强者了。这是一个值得文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法律学注意的题目。那位出于维护妇女权益、维持家庭安定的目的而在这些案件中站在女方一边的人，最终却促使尚可和解的家庭走向破裂，毁掉两人的事业和幸福，也值得一思。

一月二十一日

终于逃出家门，躲到北京军区一个招待所里来。从这里给朱洪打电话，一天也没有打通。去

邮局问，答曰一样不通。也好，这就可以真正隐居起来，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不正是我实行"狡兔三窟"的宗旨吗？

人这种动物也怪，在家闭门写作，很难实行敲门不理的方针。老是于心不忍：人家老大远来的呀，说不定是为了件大事呢。在办公室不接电话，也难。可是一进入第三"窟"，便心安理得了。其实不是照样每天会有若干起客人失望而归吗？

终究不是个办法。成袋的来信没时间看和复。写信人是抱着殷切希望的。但是叫我怎么办呢？已经采访而无暇写作的，已经答应（有的已三年了）而不能去采访的，以及手头现成的题材和线索，都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所能承担的限度了。

"你需要一个十个人组成的班子。"记不清是允洲、国胜还是克夫说的了。实际上他们三人近两年已经分去我不小的负担。一个社会，应该有一套体制，自行发现和满足它的需要。在美国，社会可以通过版税给一个作家或记者提供他进一步满足社会需要的条件。一个纪实文学的名家写出一部畅销书，本人的生活条件，他雇佣秘书、助手、侦探和律师等工作必须的开支，就可以解决了。简言之，金钱自发地解决这一切需要，而无须政府过问。这并不理想，因为迎合社会低俗

趣味的作者也能发财，虽然他的作品不见得有利于社会进步。

我们应该有一套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体制。至少，我们那些在地方党委、纪检委、信访办、检察院、法院里工作的同志，应该不必使公民和干部们千里迢迢跑到北京来找一个既无权、又无钱的记者。至少，当这个记者并非出于自愿而不得不过问本属于别人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时，不应受到责怪吧？

一月二十二日

上午写完给《镜报》的文章，基本写完《民主与法制》的约稿。下午，《人民中国》的曹复同志来补充采访。下午和晚间，看我的评论集和研究专集的文稿。

又降小雪。这大约是去冬以来北京第四次降雪了。近年来北京常常一冬无雪。无雪的冬天，简直象秃头的少女一样令人不快。

饭后散步五分钟。觉不出首钢对这一带空气的污染。昨天，当我忘记自己置身何地时，竟觉得空气清鲜得很，还有一丝甜意呢。可见人的感官是不可靠的。灵敏性往往低于其他动物。

一月二十三日

杨××来。三天前，是他电话中声音的异常频率感动了我，我便不加思索地决定请他到这里面谈。他走错了路，整整费了三个半小时才找到这里。

是个可爱的青年，三十二岁。原二炮战士，复员后在本乡任民办教师。看不惯打骂和鱼肉乡民的大队干部，他检举了那个坏人。结果招致残酷报复，孩子遭到毒打，两年后仍不能上学。医药费用掉五六千元。到此为止，是个很普通的故事。

该县“揭批查”期间拿掉的五百四十三个有问题的干部，除一人病死外，现在又全都上来了。一九五八年以来那个专区的拿手好戏——浮夸风，仍在上演。全县工业产值夸大了好几倍……

“我一直在找党，”他说，“到那里去找呢？有点象神，无所不在，又找不到。”他上访过几级纪检委，连省委副书记都见过了。他有些失望，说那位书记缺乏感情。

他还没有绝望。我当然得批评他关于党和神的错误想法。我又发生一次失误——答应他，我要去那个县采访。远的不说，去夏以来我已答应过江苏的徐州、湖南的慈利县、河北的石家庄市、

河南的信阳市……一些同志，我要去采访。为什么今天又一次轻易许诺呢？多半是去不成的。但我绝不是骗人，当时是真心实意要去的。

他让我留言，却没有一个本子。一起到军人服务部，我赠他一个日记本，题赠两句话。

他高高兴兴走了。我心情也不坏。因为他说他不想继续打官司了，要去从事实业，集资办个砖窑。我问他可有燃料？有销路？能赚钱吗？他说有，能。还说赚了钱要先使本乡农民富起来；有了更多的盈利时，把钱交给我，帮助为人打官司。

不要再上访，本来是我要向他提出的劝告，不料他不等我劝告就决定放弃上访生涯了。去年以来，我已劝告过三、四个人，还是去干点实事吧，不要上访了。冤情和损失怎么办？“暂忍一时吧。”但真正听了我的劝告的，至多只有一人——陕西省铜川矿务局的那位姑娘。她倒是答应了，也接受了我为她写的一封信，但其后下落不明，最近又寄来一份打印的状子，所以很可能并未中止上访。

一月三十一日

今晚方得暇读一封控告信。公函上盖着公章：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告的是我和另一同

志采访该校一位毕业生（上大学后因心脏病发作故去）过程中所犯的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我们对她评价过高，用了“出类拔萃”这个词，并强使校方接受，人家没有按照我们定的调子说，我们便在文章中进行“报复”。采访总要说明来意，的确用过这个词。两位教师当场表示异议，说比她优秀得多的学生多的是，你们何故非采写她不可？评价可以不同，干涉采访题材的事却是我初次遇到，不免有些诧异。那么请问，你们对她的评价如何呢？“中下等。”“根据何在呢？”……在听取对方意见时表示了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吧？至于“出类拔萃”，那是她所在的高中班团支部书记和中学、大学不少同学、老师的评语，并非记者杜撰。

还有其他错误。这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学校。“文革”期间，也是重点和先进学校。据说，十年浩劫期间，那里对林彪、“四人帮”的一套是顶着干的，因而似乎没有多少“左”的影响；对待这位女生的态度和作法上，自然也没有“左”的错误可言。她因过度劳动（已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而心脏病恶化。她被卡住迟迟不准入团，以致精神压抑，劳动中不得不拼命“表现”，都只能由她本人负责。她劳动表现不好。参加集体活动不积极，初中时期不遵守课堂纪律，生活作风不艰苦（“学

军"劳动时还吃很多糖!）怎能"出类拔萃"！……

又是一场官司。没办法，打吧。

二月三日

张飙来。他和向义光等为改变李芳洲的命运所作的搏斗，是感人至深的。本来是为了向他了解李芳洲，想不到同时也了解了作为新一代记者的张飙本人。

想认识人生吗？最好的职业是记者，而不是作家。张飙，一帆风顺走过了人生旅程的三分之一，几年记者生涯就使他变得成熟了。八一年以前，他写好人好事多。一九八二年，他陷到李芳洲事件里。真正的记者绝不会仅仅是个记者。张飙和"业余慈善家"张纪民，青年编辑、女作家向义光一起，为李芳洲奔走呼号，几乎忘记了他的本职。结果，以采访始而以既有成功也有失败的斗争终的这场经历，就成了他人生学习的重要一课。

我在他那个年龄，甚至我在今天我这个年龄，也想不到这样来结束一场自己曾经卷入的纠纷的：旅客企图奸污一个社办旅馆的女服务员，结果受到惩罚的反而是这个女青年自己，她被解雇了。团市委、妇联、社队企业局……和记者站到一起保护她，还险些打输了一场官司。最后，女

青年可以复职了，但还必须做出检查……张飙教给她以再一次妥协，保障自己未来的平安。事实证明他对了。

二月四日

和雷抒雁一起到上海参加《上海文学》组织的企业家与作家会面的活动。

一下飞机，就被上海电台的两位记者“劫持”到他们的车里。去市区途中，郑丽娟完成了她的采访。

这个女孩子，长相很象三十四年前和我一道开始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的一个湖南姑娘。她聪明，敏感，热情，天生的一块记者料。但她很快就离开了我们。

在郑丽娟这一代人身上那种悲剧不会太多了。说到底，是一个人有多少权利处置自己的问题。

二月五日

上午九时，和作家们一起去拜会巴金同志。

巴老已是八十二岁高龄，但精神仍很旺盛。同我两年前见他的情形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今天兴致很高，脸上始终浮着微笑。主要的话题，自然是不久前结束的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

会和创作自由的问题。

巴老说："给创作自由的保证，当然很好，但主要还得靠作家自己。任何文艺繁荣，都是作家自己创造出来的。沙皇俄国尼古拉一世那样的时代，还出了一大批世界闻名的作家嘛。有了好的政策，繁荣可以快一点。这次民主选举，也是个好的开头，作家们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主要是尊重作家。作家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作家要独立思考，用自己的头脑和自己的手，写出自己的话、自己对生活的深切感受。说假话是不行的。如何贯彻创作自由这个方针，还是个问题。还会有很多人不了解、不理解……"

他对文学界许多青年人赶上来和把一些长辈赶过去，感到欣喜。又说："青年人要虚心点。"这时吴强说："自然，我们也吃过骄傲的苦头。"陆文夫说："不要骄傲，但是也不要连勇气也给反掉了。"巴老赞同这些意见，说："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不怕别人提意见，我也不必跟别人走。把我的作品说得一钱不值也不怕。作家最好有个批评家作朋友。批评最好公开。八三年我住院前回答瑞士作家关于现代派的问题，《上海文学》转载了，听说有不同意见，我就欢迎公开批评。"

大家都很关心巴老的健康状况和写作生活，他说，《随想录》第五本写完后，就要写计划中的

长篇了。稿债很多。医生叫他每天写几百字，怕他失去写字能力。他还要把赫尔岑的《往事与回想》译完。想到他的字越写越小（简直娟秀得象少女），越慢，又不习惯记述，我觉得他不如把翻译工作转移给那位愿意接着译下去的友人，把精力全部用到写作上去。

二月十一日

访问《民主与法制》编辑部，与总编辑丁柯和编辑部同志交谈。

当许多文学刊物大幅度下跌时，《民主与法制》的发行量却始终以每月五、六万份的速度增长，现已突破260万份。既不是靠庸俗、低级的东西招徕读者，又主要是个人订阅。那么这个高销路是怎样得来的呢？可曾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吗？许多省市所办的法制报（尽管有一些质量并不太高）拥有的读者也不断增多。这个事实背后，肯定有不止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很值得宣传部门做一番研究。

报刊的订数，是一个值得分析的东西。比如，是公费订阅、每个办公室必备一份（而中国的各种机构与其办公室之多，肯定居世界之冠）呢，还是公民出于个人需要和意愿，自己掏钱订阅的呢？还有，一份报刊，是人们辗转传阅、因而一份报

刊有着几个、几十个读者，还是被人家往架子上一摆就无人问津，因而读者数目等于零呢？有人对我说起一家刊物，“它永远是阅览室里保存最好的刊物”，因为很少有人触摸，那么它的几百万订数折合成真实的而不是抽象的读者，又等于几何呢？

晚间到王若望家。十余位记者和友人密集王家一室，多数人只能坐在床上，站在地上，这想必也是上海同代人家中罕见的场面吧？记者同行想参观我的采访。哪有这种便宜事呢？我略施小计，便把记者诸公（也有女士）变成了我的采访对象：“各位都是久居上海的人士，请每一位说说，你们本人和上海市民对王若望这个人物的看法如何？”

关于王若望同志，我所知有限。原来他是一九三三年入党的红军时代的党员，当时是上海一个十三岁的学徒工。这个资历，这个出身，本该是吃香走红的。他却一辈子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在山东时期因反“左”，就挨过康生的整。五十年代又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二十几年过去了，仍旧习不改，没接受教训，老是说和写一些人家不爱听的话。他当然不是没有缺点的人，不会没有错误。我也认为他有些话可以不讲，或不在那种场合讲。但问题是几十年来直至今日，那些说和写相反的话的人，并且已被证明是全然错误了的人，处境为什么老是比王若望要好呢？

冯素英，王若望年轻的夫人，给我印象很深。热情干练，是一位献身型的女性。

二月十二日

前天在黄浦体育馆给《人民日报》和《安徽日报》的刊授大学学生讲课时，有人递过一个条子，因为我已经开讲，只看了个开头："我就是兰兰常常对你讲起的舒巧……"，以为不是急事，便放到一边，晚间重看，才发觉那张纸条的下文原来是："我来听课，现在大厅，因无票不能入场……"几乎急出一身汗来：太对不住这位著名舞蹈家了！赶忙请杨晓敏替我设法联系，请她来面谈。真高兴，很快就找到她，今晚她和另一位同志一起来了。

"作协大会给作家带来了春天，"她第一句话就充满感情，"可是舞蹈界离这个季节还远呢。"

她说，在国外，表演艺术——交响乐，歌剧、舞剧居艺术的首位，在我们国内地位却很低。她很羡慕作家。为什么呢？作家写一部小说，只要通过编辑这一关，就印出来了。哪怕以后挨批判呢，作品还是问世了。舞蹈就不同了。先得有剧本，然后是作曲，舞台美工，物色演员，经过排练、合乐，才能拿到舞台上来。领导审查通不过，就全完了。不演出，作品也就不存在了。

两位客人都很苦闷。在“时代歌舞”风靡一时之际，他们要为舞剧争一席之地。他们也不满足于过去的舞剧，主张创作出真正能表现人的作品。他们体察生活的发展和观众审美心理的变化，认为应该吸取些现代舞的技巧。现代舞和“现代派”是两回事。他们排了舞剧《卡门》，相信国内观众是能够欢迎的。但是它受到北京歌剧《卡门》的牵累。北京的一种观点是：正在打击经济犯罪，而卡门是走私犯，这不是提倡走私吗？舒巧据理力争：“走私犯不会来看《卡门》，看《卡门》的人也不会去走私！”仍然不灵，还是不能演出。后来又编了舞剧《新经理》，这回同走私无关了，却出现了另一个经济问题：演员排练无补贴，剧团担心没人看，收益不高，影响年终奖金，又搁下了。有人说：“现在还不是搞艺术的时候。”舒巧不肯苟同。

这两位艺术家追求的并不是纯艺术，主张舞蹈应该表现现代生活。他们要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进行探索。

两位内行和一个外行的对话继续到公共汽车末班车已经开走，谈兴仍然不减。我一向认为舞蹈不应该是一种我们生活中可有可无的点缀。吃了一点洋荤以后，更增强了这个观念。国外的现代舞是能够表现生活的，生活中的美和丑都可以

走上舞台。在美国，我看见现代舞如何给僵硬的芭蕾注入了生命，我也体验过现代舞给作为观众的我的强烈感染：在依阿华大学，有一次我坐在台上，观看王晓兰和美国大学生练现代舞的基本功时，竟情不自禁地几次想跳下台和他们一起跳……其实，早在一九八〇年我就已经有过类似的体验了。那年夏季大连举行的全国舞蹈比赛上，南京军区的几个独舞节目就很动人，还得了奖。那里面就吸收了现代舞的技法，并没造成什么毒害嘛。

我被眼前两位舞蹈艺术家的炽烈的创造热情俘虏了。怎么办呢？他们需要一笔钱……好，有了。海鸥饭店八层楼上住着一位"国际青年事业开发公司"的热情操办人，想请我参与其事。那个公司是要搞文化的，它已经募集到一笔经费！于是，我便给他们搭了桥。

二月十三日

乘"安24"飞宁波。不久前在济南坠毁的，就是这种飞机，而且那架飞机就是当年开辟上海——宁波航线时的首航第一机。想起前天早餐时一位民航女同志为飞机所作的辩护："其实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只不过汽车、火车失事很少报道就是了。"

没觉出人们时常说起的乘小飞机那种不舒适感，和波音大机没什么不同。也许因为“安24”并不太小，它有四十八个座位。不舒适的地方，是绝对不准吸烟。（这是中国民航国内航线上普遍的规矩，只有这一点，我们的民航与世界其他大国的航空公司相比居于先进地位）只能躲到厕所里去吸，还得象做贼似的，因为那里也是禁区。悲哉，烟民！

宁波的市容同它的名声大不相称。几年前建起的楼房已经显得相当陈旧了，大概是过于简陋，太不注意外表的原故罢。当然，更令我惊异的是《宁波日报》社与宁波市文联两家合起来都没有一部轿车。但尤其令我惊异的还是《宁波日报》社的社址，同咫尺之隔的市政府高大宽敞的楼房相比，它就活象一座破败不堪的古庙。一位市委领导同志也并不掩饰这个城市对于文化建设的疏忽，说：“我上小学时，市里有一个体育场，现在还是那个体育场！”这大约是历史上重经济而轻文化，后来又重政治而轻文化的结果吧？相信这一切正在改变。

下午同报社同志座谈。晚间同文艺界同志座谈。明日上午要给刊授大学讲课。午餐后去杭州。把游览留到来日。

二月十四日

到杭州，不想惊动，想不到还是惊动了《浙江日报》。悄悄地看望一下内兄就离去的打算破产了。

浙报文教部编辑冯颖平陪我。今晚她随便说了几句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馨的为人，就诱发了我太易被诱发的兴趣，立即决定当夜去采访。

当代英雄人物最主要的特色是什么？在领导干部中，我看就是胆魄。厉德馨最先吸引住我的，是一九八三年秋冬那个季节里他敢挺身而出保护了杭州市的文艺界。他不准《杭州日报》发表某些文章，他制止了某一类座谈会的召开。对《江南》上的小说《希望》作者的批判，上纲到了"希望在台湾"的高度，他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又在重演整人的一套，后果不堪设想，便派两位副书记到作者所在的工厂，告诉那里的领导不要对作者施加压力。又找当时精神已相当紧张的作者、青年工人张廷竹谈话："有错误，你就检讨；没有错误，你不必怕。不要有什么顾虑！"

"就是作品真错了，又怎么样？"厉德馨说，"不能拿一批批大帽子去压人。作者为什么不可以犯点错误呢？我们这些做领导工作的人，不也常犯错误吗？鲁迅是个天才，可是他的早期和后期也不一样嘛。若要求鲁迅每篇文章都必须完全正确，就不会有后来的鲁迅了。这次作协四代会开过之

后，是非就更清楚了。作家不敢写，文学能繁荣吗？过去文艺界折腾太多，吃的亏太多了，还不改，行吗？什么地方清'左'搞得彻底，那里的文艺才能够繁荣。"

厉德馨解决了一些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去年起，杭州人说："现在西湖变大了！"从前，从杭州车站下火车，乘车入市，你看不见西湖——各种建筑物把西湖给掩埋了。都喜欢那个好地方，湖里湖外建了各种别墅和房屋。二十余年，谁也拆不动。厉德馨坚决拔"钉子户"，不管是省里、市里的单位，该拆的一概得迁。广场上有两家是杭州铁路分局的人，市长去了也不听。厉德馨就对铁路分局说："再不迁，我就把这两户送到你办公室里去！"果然很灵，拆迁了。一年就拆掉近一万平方米，没收二三万平方米。现在建起环湖公园六个，半个西湖都在市中心袒露出来了。现在，凿山引水的工程正在进行，不久西湖就会变成活水，每天有三十万吨水质好、水温低的江水流入，一个月湖水就可更新一次。苦于夏季酷热的杭州，市区气温可下降二度。

牛奶紧张，奶票卖到十元一张(一月)，却没人敢改变国营牛奶公司的体制。厉德馨决定把奶牛交给农工个人饲养，产乳量一年便猛增一倍。龙井茶产地，居民饮不到龙井茶。改为承包到户，

农户可以炒茶卖茶，现在可以买到了。（钱塘）江（运）河沟通，原由省交通厅管，几年花了几百万元工程费，进展奇慢。八三年交给市里，一年半即可完工……

于是我又想起那个老问题：制度是一样的，政策是一样的，四川自贡铸钢厂能从十年老大难一跃而成为全国同行业冠军；连云港市能打破长年混乱、保守局面；西安电影制片厂能从爬行转为腾飞，靠的无非就是一个或几个敢于打开局面的共产党干部——王子珍、叶志俊和吴天明。杭州又是如此。难道别的城市、工厂和文化单位，就绝对找不到这样有胆有识的干部吗？我不信。我绝不相信。

二月十八日

本来已决定在上海过春节，一来是可以完成对上海三个人物的采访，再去杭州完成对厉德馨和杭州市变化的采访，二来也可以会会几位多年不见的老友。近两天发觉，春节期间在这里是无法工作的，王蓓在黄浦江上的一句忠告——“你可以回去过节，节后再来嘛！”使我下了决心，还是回家。

此次上海之行，结识了新闻界一些前辈（可惜未能去拜见王中同志）和后起之秀。有缘和敬

慕已久的天才导演谢晋同志相识，见到了电影界一大批名人和领导人，是意外收获。

一个小小发现，是据介绍，我原先抱过反感的两位文艺界和新闻界人士，人品都很好。思想"左"一些，属于认识问题。我纠正了自己的偏见，并由此想到，恐怕有相当一批这样的同志，我们之间是应该也能够捐弃前嫌，团结在一起致力于文艺和新闻事业的繁荣的。耀邦同志提出的"大团结——大繁荣"，在我心里有了更充实的内容。

今日上午和《解放日报》、《民主与法制》的同志一起去海运学院。从二月五日起，我便继续对倪育贤问题进行调查。今天是最后一场。倪育贤一九六二年以来的政治表现，基本弄清了。他在被无理开除之后为谋求生路给徐景贤的信中所写的违心之言，遭到三天吊打之后被迫写下的供词，早属于应予销毁之列，现在还拿出来企图借以加罪于人，是有点过分了吧？缺点，也是有的，但古人早有"瑕不掩瑜"之说，只不过今人往往忘记这条古训，对于毛主席关于"人无完人"的教导也不大肯用于自己不喜欢的人身上就是了，然而对于当年造反起家、现在还不断散布反对党中央言论的人，倒相当宽容。这二者之间，不会没有一点因果关系吧？

路上，我特地问了一位同行的上海人："一九七七年二月那个时候，在上海闹市张贴大字报公开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请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工作这种事，多不多？"回答是："很少见。"倪育贤此举，绝非一时冲动，是他十五年来思想发展的一个结果，用"政治投机"是解释不通的。投机的话，一九六八年他编印《列宁语录》，为什么就辑录了列宁的几乎全部反"左"的论述呢？

报告文学能不能写有缺点甚至犯过错误的好人？我们归途中有所议论。这应该是不问自明的问题。作品中对一个人的事迹有所反映，也并不等于树他为"英雄人物"。

三月一日

终于有人研究人的学问了。许金声当然不是第一个，但他寄来的论文还是有些创见的。

题目是：《人格三因素论——一种关于健康人格的理论设想》。他把人格力量分为三种：智慧力量（信息加工的能力），道德力量，意志力量。一个人这三种力量越强，在遭受挫折时，就越是更多地采取"应战体制"而不是"防卫体制"来回答挑战。他赞同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主张，认为适当的挫折可以使健康人格的"应战体制"以及三种人格力量得到更多的锻炼，从而增强通向自我实现

的能力。在非良好条件下、特别是恶劣条件下，三种力量中任何一种力量的缺乏都可能造成不健康的人格：缺乏道德力量——倾向于发展为一个野心家；缺乏意志力量——倾向于发展为一个缺乏骨气的"善适应的人"；缺乏智慧力量——倾向于发展为没有灵活性、刻板的人，或经常好心做坏事的人。在非良好条件、特别是恶劣条件下，缺乏两种、特别是三种力量的人，容易成为犯罪性人格。

他还论述了三种力量与"真诚"的层次，三种人格力量的相互关系，三种人格力量和三个具有全人类性的道德理想——人道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格发展的可选择性，等等。

非专业人员中，现在也有一些同志在研究人的问题了。我想起上海的龚治权，一位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历尽坎坷的同志，他研究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问题已经多年。在去年来信中他写道："《共产党宣言》中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的要旨，是自由与发展，合起来形成一个特定范畴。这两个概念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一直是一些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的人的主要攻击目标，好象只有把自由与发展批倒批臭，在人的意识中消失，才有共

产主义。而事实上只有真正理解马克思这句话，在社会主义社会为它的实现创造条件，才有共产主义的未来。”为研究这一问题，他已写了五十多篇论文。其中有这样一些题目：《论自由》《这一个人》《判断与生活方式》《“你算什么东西！”的矛盾本质》《人在社会关系中》《发展的人》(五篇)《道德与人性》(二十万字的著作)《人与人的关系》(十万字)。有些具体题目，对于我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我看还是有现实意义的，如《道德不能成为现代生产力发展条件下改造社会的主要力量》,《欲望与思想》,《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矛盾》,《利己主义与自我牺牲》,《作为生产合作关系对立面的权势关系》,《利益与利欲》……

他对社会科学理论界的现状不满，他本人又“地位卑微，孤掌难鸣”。一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他的那几十万字论文是否仍然是他本人寂寞的自白？

三月三日

给《人民日报》刊授大学在北京的学员讲课。两位学员提出的问题竟不谋而合，很有趣。通县的郑××同志在听讲前夕写好一封信。二十岁时，五十年代，他曾想“从哲学和文学中找寻生活的答案”。他说：“在众多的作家中，我有两个偶

象，一个是王蒙，一个是你。……你们更敢接触生活，解释生活。三十年过去，当年桓温的'树犹如此，人更何堪！'的感触，也就时时撞击自己心头了。……你的作品，我陆续地读了可能到手的一些，我觉得最主要的特点是大胆，有点不要命。……你没有给自己留退路，却使别人更清楚地看到了路。我不喜欢'仙人指路'（这在武术上也是很危险的一着），而欣赏鲁迅先生关于'路'的说法。不过我总觉得你还没有写出一篇能超过《本报内部消息》的文章。"他是搞生产的，他说："闯到新闻学中来，一是为了求知，也是想多给党做些工作，当退到第二线时，笔还可以留在第一线。不过我有一件糊涂了几十年的事，要向你求教：我们的正统理论（我崇拜，而且一直以正统派自居甚至自傲），要求新闻要最真实，而我们的新闻在三十多年中却常常并不真实，我不是指一般小事，而是指大事。比如对胡风集团的报道，对反右斗争的报道，对大跃进的报道，对'文化大革命'的报道，对周总理逝世的报道，对大寨的报道，对小靳庄的报道，等等。刘宾雁同志，你想过没有：这个矛盾怎么解释呢？再有，我们有那么多有良心、有党性的记者，他们在保卫新闻的真实性上怎么会不见战绩呢？我从未在报纸上看到过哪怕一小条关于这种斗争的信息。我很想知

道一个正直的有党性的记者是怎样保证自己报道的真实性和怎样为这种真实性而斗争的。”

另一位学员，从字迹看，要比他小三十岁，条子是听课时即席写的：“人民日报有条不成文的规定：‘一个好记者必须是一个党性强的好党员’。这条原则与历史大事报道的不真实有什么内在联系？”

我没有回答这两个问题，因为我还闹不明白呢。我还要为另一个问题寻找答案：为什么在一九八五年的春天，会有两个中国人同时提出这一个问题呢？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这个信号所透露的那个发展中的现象，具有什么意义呢？

三月四日

还有这样奇怪的单位。“你的文章在我们这个知识分子密集的单位，有如‘雪落黄河静无声’。还是一位有心的同志悄悄告诉我《人民日报》上有这么一篇好文章。当我找这张报纸时，有人问我：‘有什么好新闻？’我却支吾地说：‘不，找一个广告。’

“在办公室聊天，无所不谈，唯独‘莫谈国是’，不谈整党，不谈清理‘三种人’，不谈选拔干部，不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凡是党报正面宣

传而与本单位有联系的文章，一概不谈。

“粉碎‘四人帮’八年了。还有一种屁股坐在盖子上的人——这大概就是你文章中所指的‘分享文革’实惠的人，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一种社会势力’。不能小看这种势力，它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正阻碍着党的路线的贯彻。

“为了消除这个隐患，就需要千千万万忠于党的路线的有卓识、有胆略的同志坚定不移、旗帜鲜明地去鼓吹，去贯彻，去斗争……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好心而糊涂的革命党人自诩‘兵不血刃，传檄而定’，‘不念旧恶，咸与维新’，致使‘杀害革命党的白举人又做了革命党的官’，胡折腾一气的阿Q终于趴在地上在供词上画了个很不象样的圈圈。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当然不能与此混为一谈。其本质的不同在于以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党中央是清醒的，英明的，强大的，牢牢掌握着革命的航向，开创了今日的大好形势。但我担心在有些地方，浑浑噩噩的老好人还和少数能量很大的坏人和平共处呢。

“我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了，灾难已熬到了尽头。对这些问题，我已是局外人，也可以‘少管闲事’了。但血管里的血还没有完全凝固，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还希望到二〇〇〇年看到一个更强大更健康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一个突起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

我相信他的真诚。我为这样的老人感到自豪，因为在另一个世界里，你很难找到饱经劫难而仍然怀着如此热望的人。

他还有一句话，我也应记录下来：“‘知识分子’是一个复杂的阶层。有挨整的知识分子，有整人的知识分子。长期的极左路线培养了一大批整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但由于整人的把大量时间精力都花在整人上，而挨整的只得默默无为地在知识上找寄托，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知识的两极分化——天道是公平的。”

三月五日

在我六十岁生日的前夕，收到家乡哈尔滨市寄来的一份贺礼——一封匿名信。

> 你说别人在造你的谣言，我看你也在造别人的谣言。譬如你指责某位“应该是水平很高的同志登门追究责任”，可是又故意隐约其词，就难免要让所有高水平的负责人背包袱了，无意中为别人提供了攻击一些好同志的口实，不知你是否“深以为憾”！你指责香港出版的一本专集*点名批判“左”倾投机者，那么你

---

* 指香港出版的一本关于我的专集，载有一幅照片，还特别标明哪个人是一九五七年批判过我的一位评论家，我曾在讲话中说过不必出此一举。

为什么不公开同××交流一下呢？人家倒很光明正大，鲁迅、冯雪峰就不是东西！你想高姿态，也犯不着借着骂别人的唾沫星子来洗自己的手罢？而且你张口闭口“我们只能团结而绝不能排斥……(下文是：“有‘左’的思想的同志”——宾雁)，“我们”显然是指你们“右派”一群了！可见，你的宗派情绪还是很厉害的嘛！希望你今后为人为文务要光明正大，旗帜鲜明！不要老是打哑谜，让读者一肚子火儿没处撒，只好骂人出气！

十九岁读者　××敬上

这是我近六年来收到的两万余封来信中最“光明正大”的一封，不但标明年龄，还写了一个你永远不会找到的那个地址！

笔迹倒象是个十九岁的人，然而信的内容和情绪，包括用词，三十九岁以下的人是绝对写不出来的。我不相信一个十九岁的中国人会对他诞生前九年起遭难的“右派一群”怀有如此炽烈的仇恨。

我的手是不需要洗的，因而也不需要骂人和“唾沫星子”，倒是想问一问写信人：阁下的手若没有染上某种洗不掉的东西，何至于满腹怨恨，对于几年来除政治凶手、歹徒和经济罪犯外未攻击过任何人的作者“一肚子火儿没处撒，只好骂人出气”呢？

很好的一份生日礼物。信上的唾沫星子，就

是我几年来工作效益的佐证。哈，他们发狂了！快哉！

三月十日

还没有接到过这样的邀请。山西省原平县的四位县委书记——吕日周、王登昌、赵生才、张存寿同志联名来信，请我到这个山西省改革的试点县“走一走，看一看，到改革的激流漩涡中体验一下生活”。非常欣慰！

原来他们也是我的读者。

附寄若干材料。经济改革的显著效益是振奋人心的。全国很多报刊已经报道，那么我还有什么可写呢？有。信中所写一年多来“经过尖锐复杂的斗争，终于冲破‘左’的束缚，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个过程，报刊上还没有充分写出来。几位书记自觉地改变当地干部、群众传统意识形态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我也很感兴趣。还有，那个县的纪检委，是出席全国纪检工作会议的唯一一个县级单位，一定也有它独特的经验。

三月十二日

和宋秀兰会面，至少也是第四次了。她从七十年代起就和大兴安岭的贪污盗窃分子、以权谋私的干部进行斗争。一九八一年《黑龙江日报》曾

以头版头条地位表彰过她的事迹。一九八三年夏，《黑龙江日报》又发表了她遭到商业局科长殴打的消息（她挨打，远不是第一次了）。现在，她仍在继续她的马拉松斗争。

真正是可歌可泣！今天得知去年五月间胡耀邦同志在她的申诉、揭发信上作了很长的批示。黑龙江省纪委派出调查组查了七十余天，尚未上报。宋秀兰对那次调查是不满意的。我问她：去年来过的加格达奇木材部门的女会计刘显筠的情况怎样？答曰："她揭发出来的大贪污犯张杰（女）已拘留将近一年，至今未开庭审理，不断有人说情。刘显筠本人现在正在受折磨：不给她工作，还得上班，坐在那里受人挖苦，讽刺。精神已接近分裂。"

……

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女性，应引以自豪。然而这些女性遭到的压制、迫害和摧残，又使我们这个民族脸上无光。

又是那句老话，最可怕的、祸国殃民的自由化，难道不是在这里吗？滥用权力保护坏人和打击好人的自由，足可窒息中华民族的生机。

三月十五日

正在整理行装，准备中午去石家庄，听到有人叫门。朱洪赶忙去迎住，告以我实在没有时间。

听话音，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后来，朱洪又告诉我，那两位来客还在大门口等着，我去报社时要小心。后来得悉，那是来自唐山市的两名惨遭打击迫害的女会计——又是宋秀兰式的女性！

实在是没有时间。两个小时里，我要为安装电话问题再写一次信（由于只能由别人传话，把约定时间搞错，我和两位美国记者在星期二、三分别在建国饭店空等了对方一个多小时）；找群众工作部徐放同志谈甘肃问题；找记者部领导谈湖南省南县问题；找报社领导谈应邀访问西德和美国的问题；抄写党员登记表；查找河北省读者来信；找张平力谈山东省姜怀玉案调查材料的印刷问题；给孔罗荪同志打电话谈郭芸泓的工作问题……

仍然未作到轻装——必须带走的材料太多，背包和提包都很重。时间很紧了。不料还未出大门，又遇到陕西铜山矿务局的卫生员李巧环。只能一面走一面谈了。再次劝她放弃上访。她说又发现了那里一些新的问题。我说算了，你都三十岁了，铜川不得归，就先到别处找个工作暂时栖身，以后再告吧。我不是介绍你去找郑秉琦同志了吗？那是个好人，她也说是，见过，待她很热情。我说那好，去吧，别上访了。她表示同意。我上了公共汽车，却并不放心。上次她也答应过

的，不久又连续寄来两份打印得很精致的控告材料。

在305次列车上看今早来客留下的材料，心情不禁为之黯然。我应该见见她的。又是那个"四人帮"后期以"教育改革"闻名于世的那个朝阳市！

这是一份渗透了血和泪的控诉书。王巨是大学毕业生，事件发生地是文化局，时间是距二十世纪末不到十五年的今天。王巨犯了两个错误：一，她不肯作局长和局长夫人——她顶头上司的儿媳；二，她不肯介绍那位夫人入党。还有第三个错误——她不该向自己视为神明的父亲坦露自己的苦闷和真实思想，也不该把其父依据古代定理书写的大批判文件保存下来，以致被局长夫人依权取走，翻印和散发，成为她的思想罪状！她个人生活中的不幸也被广为传播，成了中伤她的手段。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谁让你遭到不幸呢！

只有两种可能：王巨诬告朝阳市文化局长夫妇，构成诽谤罪，应依法惩处；或者，文化局长夫妇违反共和国宪法（去年是第一部宪法诞生三十周年！），严重侵犯了王巨的人身权利。怪哉，难道朝阳市没有法院吗？

三月十六日

昨天来石家庄。如果不算一九四四年夏越过

一个日本军岗楼、徒步横穿冀中平原、偷越平汉路那一次经历的话，这就是我头一次到河北省来了。

想不到在这里遇到吴有梧！服装现代化（他穿上了皮夹克）的结果，险些认不出他来。

他是最早发现刘永江的人。但在了解到刘永江的遭遇之前，生活已经把他推上一条并非他自己选择的道路了。今天，他向我介绍了那个转折。

他生性温良，甚至有一丁点儿女性气息。自幼酷爱学习，宜宾地区武斗正炽之时，他从母亲焚烧的父亲藏书中抢出几部古书。创作欲望从此就萌发起来了。他的兴趣本来在古人身上，写黄庭坚，写辛弃疾。生活却硬逼着他选择了现实题材，还是个阴暗面！

这，应该责怪谁呢？应该责怪这个年轻的作者，还是那个宜宾县蕨溪区供销社的保管员侯兴氏呢？一九八一年，吴有梧看到侯兴氏在街上破口大骂党支部书记张国民，又看到那侯兴氏在这条街上修建中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她从哪里弄到这许多钱的呢？"一了解，全是赃款——酒里加水，改发票，偷窃货物。两次被当场抓住，仗着和区委书记关系好，不但没事，还能把反对她贪污盗窃的支部书记张国民逼疯，唆使人打他，往他嘴里灌大粪……"那时我心中一股气，一股无

名怒火遏制不住了——怎么在我们的社会里，好人还要遭殃呢？”——吴有梧说。可见，“写阴暗面”的人并不都是对社会主义或共产党怀有敌对情绪的人，吴有梧就是出自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应该保护的好人的同情才走上这条道路的。

他开始“干预生活”了。不是写作品，首先还是替受苦的好人鸣不平，告状。他写信给县委、地委和省委；他跑一百多里路去找知情人调查。他胜利了。一九八二年九月，四川省人民电台公布了这个贪污分子的罪行。

八一年下半年起，他又过问刘永江案。他乘杂技团（他是杂技团乐队的演奏员）去泸州演出之机，到六二五厂调查。从此，他就把全部业余时间用到这上边去了，自费走访了了解有关情况的很多工人和干部。这时，旅馆服务员周××一案又引起他的注意。她在打击流氓犯罪分子时被捕入狱，其实是个受害者：十六岁时为父鸣冤告状时被奸污，后来，就成了一些干部的玩弄对象。结果，那些人没事，她倒成了罪人！吴有梧决定写一篇报告文学——《一个与十六个》。可是他遇到了一个难题：不许他看案卷。当然，即便看了，写了，又到哪里去发表呢？

吴有梧一面创作，一面给许多人写状子（很难说这两种作品中哪一种更费力、更冒险）。起

初，他不敢写，怕惹事；又觉得写了又怎样？未必能解决问题。但是——可见又不能怪他爱写阴暗面了——“我实在看不下去呀！”

有些事，初听，他也不肯轻信：能那么坏吗？一旦查明属实，他就拼命去帮助，去呼吁。收获，是手里一大摞无处报销的车票，和少提一级工资。工龄比他短、技术比他差和犯过错误的人，都提了级，唯独没有他。

妻子支持他，只是替他的安全担心。

三月二十一日

在国内和国外，关心中国前途的人都很关心中国的军队。但是连我本人在内，对我们军队的了解都很少，对于这支军队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就了解得更少。一提“解放军”，脑子里的形象往往还是当年的八路军。

在石家庄的北京军区陆军学校住了几天。从这个学校，看到了我们军队的未来。

校长李双柱同志带我参观校园时，我不时为这个学校发展之快感到惊讶。一九七七年年底，这里还是一片荒滩，基本上一无所有。邓小平同志有个指示：一九七八年二、三月开步走。三个月后就真的开学了，当年就招了六千名学员。口号是“一面教学，一面营建”。现在，矗立在眼前

的是二十三万一千平方米井然有序的一排又一排大楼。

回想当年，"四人帮"粉碎才不过一年，小平同志何以会对建立一所军校提出那样紧迫的要求呢？从军校的现状里，我看到了答案。他高瞻远瞩，很早就有了改造这支军队的雄图大略。

建校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改革。方针是放弃过去单纯"突出政治"和大搞形式主义的那一套，对延安抗大的那种"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方针，也得改一改。中心是培养现代化战争所需要的人才，智德体并重，又以智能为中心。从今以后中国再不会有"没有文化"的"愚蠢"的军队了。

这可得需要点胆量，因为旧的教学大纲陈旧了，新的还没有。改变军队院校的大纲，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校长李双柱和政委宋双来就有这个胆子，改了。不改也不行。过去是以打步兵战为主，现在要打坦克、飞机、空降和"三防"；过去是单一作战为主，现在要各兵种协同作战。总之，光靠两条腿打二百米近战是不行了。他们先后四次修改了教学大纲。在过去，那是犯法的事。现在，他们还受到了表扬。学校全面实行了电化教学，幻灯、录相和电影是常用的手段。管理上应用了系统论和信息论原理，普及了小型电

子计算机和微型电脑。还自己编写了《军事教育学》、《军事教育心理研究》、《青年战士心理研究》等教材。

这实际上是一种科学试验：有了较高文化和独立头脑的军人，会不会就不那么忠诚和不那么勇敢了呢？在边境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答卷出来了：老山战斗中，军校的一百二十名学员（大部是大专和大专以上的学生）分别单独指挥一个排，除一人生病外，全部立功受奖。

这些在陆军学校大学班学到高等文化与军事知识，会一门外语、每人都会使用电脑和驾驶汽车的学员，正源源输入我们的军队，从排长做起，一步步取代原来的各级指挥员。他们，加上普遍具有高中毕业水平的战士，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军队。而这样的军队是只能捍卫进步、不会拥护倒退的。

三月二十五日

耳闻是虚，眼见为实。对于袁厚春的报告文学《省委书记》，现在有人还半信半疑。和高扬同志两次交谈，对河北省的工作有所了解之后，我就为这位七十五岁高龄的老前辈感到庆幸了，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一个这样辉煌的晚年的。

省委书记我见的不多，但六年来我跑了十几

个省。第一书记这样重视文学艺术的，我还未曾见。他读文艺刊物上的作品，甚至比我们这些带着作家称号的人还多。我猜想理由和袁厚春也会有同感。

学识渊博、富于灼见固然可贵，但最难得的恐怕还是他虽从政多年，仍能保持那种对生活的新鲜感，锐意进取的精神大约就是以这种情感为基础的。

保定一个中学的校长寄来一本《美学纲要》手稿，说是从五十年代起研究美学，读了五百部书后写成的。高扬读了七八万字的简明提要，觉得结构和思路严密，有出版价值，准备向王朝闻和李泽厚推荐。但为了得出这个结论，他本人就非得读一摞美学著作不可。财贸学院教师李杰，五十年代在西北交大读数学的，从对数学原理的思索中萌发出一个哲学观点，还相当大胆，认为：对立统一规律并不是事物发展的绝对规律，相对与绝对才是万物发展的根本规律。他研究了二十几年，写了一部著述。先写短简问高扬：你有兴趣吗？有，我就寄来。答曰：有。寄来了，毛笔小楷工工整整写了十几万字。高扬饶有兴味地读下来了。他本可以往宣传部一转了事，却转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附函请专家鉴定。同时让省刊发表。（本来在一次学术会上讨论时，大

多数与会者就赞同这个观点，但省刊不敢发表。）

“几十年的功夫呀，”高扬说，“人还特老实。”短短这一句话，流露了他对知识分子和精神劳动的珍视。

难怪有好几个省的知识分子纷纷写信要求到河北省工作呢。

但在我心里这杆秤上，份量更重的还是他在起用干部上的胆识和不拘一格。省委秘书长、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保定市市长和秦皇岛市副市长等人，都是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宣传部副部长郑熙亭我面谈过，王宏烈（就是那位秦皇岛市副市长）说他有一颗“水晶般的心”。

郑熙亭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根本不象当官的。那身打扮，那个风度，倒令我想起某个村庄的小学教员。他的风趣和幽默感（还带点河北的土味）也使我感到亲近。他老说他随时准备回沧州老家治盐碱地去（当“右派”以后大部分时间他就在那儿治盐碱地，对改造盐碱地，他仍然津津乐道）。来省会工作，他一不转户口，二不带家眷，真有点随时准备丢官、打回老家去的意思。听说很多同志对于沧州地区失去这么一位好专员，也很惋惜。

正是高扬和这个郑熙亭，还有那个传奇性人物（报告文学《从囚徒到市长》的主人公）王宏烈，

使我对河北省已经发生的变化和正在进行的斗争发生了强烈兴趣。一九八一年我曾计划把连云港作为中国的缩影写一篇报告文学，为什么不可以写写河北省呢？

我用过的一个比喻，在河北省就是现实了：一场自然灾害，比如地震（唐山！），留下的不过是一片废墟；社会灾害，却在物质和精神的破坏之外，还会留下一种阻碍清除这场灾害后果的社会力量。

然而我也深深地相信，在河北，这一切正在成为历史的陈迹——不会太快，但比我去过的某些省份却会快得多。

三月二十九日

中国作协会员代表大会后的第一次主席团会议，讨论作协一九八五年工作计划和最后审定作协章程。巴金同志出席了会议。

今年文学作品的几个评奖委员会的同志分别报告了评选情况。最令人振奋的是中篇小说创作近两年的突飞猛进。吴泰昌做了很好的分析。一九七六——七七年全国总共只出现12部中篇。一九七八年——36部。一九七九年——84部。一九八〇年被认为是中篇小说的丰收年，那年出了172部。而一九八四年八五年却一家伙出了1,550部中篇小说！不仅仅是数量上升了，题材也更加

广阔、多样而丰富了；内涵较深，作者的历史感也更强了。只是写改革题材的，艺术上精湛者少。中青年作家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力，更加明显了。第一届评奖，十五名获奖者中四十岁以下的仅有二人；第二届，二十名获奖者中四十岁以下的就达九人了。这一次，二十名作者中二三十岁的作家竟达到十二人。很多青年作家出手不凡。

没想到老一代作家到会如此踊跃，发言也很踊跃。还讨论了议程以外的一些问题。

对作家征收所得税的问题，批评和反对的呼声已经响了几年，毫无作用。这件事本来就有点滑稽，想不到竟能坚持几年硬是不变！依法，是对"一次性收入"超过八百元者课税。几年劳动的结果，也算"一次性收入"吗？本来不难弄清中彩票和写作品的差别的。记得一九八一年我就请教过叶君健同志。他说北欧国家是从作者稿费中扣除一本书写作期间作者的全部生活开支（包括旅差费、招待费等等）之后，就余额征税的。我又听法国朋友说，法国税法，是把一部作品的收入分摊到几年计算，然后根据每年的收入征收所得税的。我们的年轻作者工资很低（鲁迅文学院的本届学员大多是得过奖的作家，月工资在三十八元到四十余元者大有人在），吭吭哧哧用业余时间写了几年，也许几部作品中仅有一部能够出版，好，

一超过八百元的就抽去20%，太说不过去了吧？

成立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的建议，一些同志表示赞同。但如何保障、能保障些什么和究竟能保障多少，老实说，我心里也没底。

会议整日在各种炊具敲击声和食客说笑声中进行。因为中国作协还没有一间容得下三十几人的会议室，只能在旅馆的餐厅中举行。你环顾一下四周，看看哪一级机关拥有这样的会议室，便可判定中国作家协会属于哪一级组织了。

四月二日

在南京举行小说和报告文学的授奖大会。中、短篇和报告文学获奖作品，打头的都是解放军——李存葆、宋学武和袁厚春。这是件意义不小的新事，又绝非偶然，乃是军队作者在创作上有了重大突破的一个标志。三个得双奖的作家——铁凝、梁晓声和王兆军又都是三十几岁以下的人。这两件事都可喜可贺，可谓双喜临门。可惜今日无人备酒。我呢，竟成了获奖者中年纪最老的一个。对中国文学而言，也可喜可贺；个人，则不免有怅然之感。我们的时代已经逝去了！这又是人类绝对没有办法的事。

三十二岁时我不觉得自已年轻。四十一岁，“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按现在的标准也还算比

较年轻，然而当时已颇有老矣哉之感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一九五七年，并且自我感觉也象是三十二岁那个样子了。这种幻觉，现在可能正逐渐消失。衰老，尤其精神上和感情上的衰老是可怕的，原因并不在于一天天接近坟墓。死亡并没有什么可怕，何况走向坟墓的方式多种多样，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呢？

四月三日

分组讨论。报告文学组热气腾腾——人多，争着发言，甚至有些小的交锋。每个人的发言或插话还都有一定份量。

不断听到读者反应：同小说相比，他们更爱读报告文学。今天的会，表明报告文学作家没有辜负读者的期望。

袁厚春谈的是个大题目，总题目，涉及报告文学的使命及它和时代的关系问题。“近年来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已不限于写一人一事了。应该更宏观地摄取生活。读者有这个要求。他们要求写他们最关心、同自己命运紧密相关的问题。”他说写报告文学是无异于从事一项冒险事业——这句话的内涵是很丰富的。那么，作家是不是退却了呢？“每次开会，都先喊一通苦，但喊完以后却没有洗手不干的。”

理由的发言比较系统。我心中一些朦朦胧胧的意念被他道破了。“从一九七八年以来，我们的报告文学一直保持着持续繁荣的势头，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空前的(梅朵插话：作用也是空前的)，还会继续繁荣下去。这是因为时代的需要。在我们这个时代，报告文学确实是大有可为。应该允许作家讲真话，清醒地反映生活的实态。这样，各级领导就会多一条信息反馈的渠道。我和厚春、宾雁刚刚见过河北省委书记高扬，一位忠厚长者，他就说：‘看文学作品可以使我了解很多下情。’由于报告文学没有‘虚构’这面盾牌，它就需要更多的保护。让一个作家只代表他自己（他本来就不、也不可能代表某一组织，——我想），让他文责自负，给他观察、判断、认识生活和提出问题的自由，对党和对社会是有好处的。由于报告文学对客观环境依赖性更强，稍有风吹草动，它最敏感。我认为，对一篇报告文学有不同意见，可以公开发表，讨论，而不要诉诸行动手段。应该把它当作一种文学样式，而不是新闻作品那样对待。”谈到报告文学的发展方向，他说：“我从自己的写作经历和《秘密的中国》、《震撼世界的十天》和《上海——冒险家的乐园》这些作品中体会到，报告文学应该更多地从宏观上驾驭生活素材。写凡人俗事、儿女情长和闺房琐事，我看不是报告

文学所长。它毕竟不同于小说，小说更宜于写微观的、内向的东西。报告文学就是要写重大题材，写众人关心、最近发生的大事，要有力度，有时间跨度，有厚度，有深度。即使写一个人，也应该有最大限度的信息量。要浓缩。报告文学的美学标准，应该与小说有所不同。总之，信息量，浓缩度，震撼力，这应该是报告文学所特有的。至于表现方法，我看应强调客观性，作家可以作超然性介入。强调对行动的描写。也可用白描手法，某些先秦笔法。干预的意念性越隐蔽越好，使读者有更多的回味。”

有人对理由的“写重大题材”表示了不同看法。但我细听下去，又似乎并无大的分歧。

来自哈尔滨的青年作家蒋巍着重谈了报告文学作家的甘苦。“告状打官司还在其次，最令人苦恼的是作品的主人公往往因你而陷入无穷的灾难。你本意是把他抬起来，结果却适得其反！……于是，后来写作中我就尽力注意不给主人公设置人为的障碍，比如不提往事，尽管我内心的愤怒难以抑制。这样，麻烦固然可以小一些，但报告文学的战斗力却不能不减弱了。”

乔迈介绍了他的经验。事情本身的滑稽加上他特有的幽默（此公的幽默属于不外露型，隐藏在近乎纯客观的叙述中），引人发笑。那经验，一

言以蔽之，就是以现行体制的特点做自己的盾牌，既保护了主人公，也保住作品。他讲的那两个事例本身，其实就可以写报告文学。

青年作家王兆军指出，近期报告文学的题材有单一化趋向，比如都写搞改革的厂长之类。但他着重谈的还是作者本身的局限性问题。

（所引发言，未经本人过目，记错了由我负责。——宾雁）

四月六日

晚间到南京大学演讲。从未见过这样热气腾腾的场面。台上、台下坐满了人，每一条夹道都站满了人。特别是中间的通道，实实地五人一排站立着，前后左右不留一点空隙。一千余张年轻的友好的热情的面孔加上几百副近视眼镜的反光，更使这气氛浓重得令人兴奋到迷醉的程度了。

这并不是第一次。温元凯来演讲时也出现过同样的场面。

这时，我心中闪现的第一个意念是：希望！这里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又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

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能找到这样的听众和这样的大学生呢？

我谢绝了座椅。几百个年轻人站立着，我怎能安坐呢？站着讲，我还心疼面对着我站立的听众呢，我毕竟有大得多的空间，可以移动身子，挥舞手臂，倚着桌子，甚至吸烟。将近三个小时，除了笑声和掌声以外，始终是一片凝静。

我演讲最多的时间，是一九七九年初夏至一九八〇年初。后来就尽量谢绝这种活动了。那十几次演讲，听众递上来的条子，一般用一个纸袋便可装回。这一次，我却不得不向主人借一个书包了。我只能回答其中小小一部分。我担心有些同学会失望。

原以为八〇级学生入学后，政治兴趣远不如前三届学生了。今晚的场面之热烈竟几乎超过一九七九年冬北师大那一场（小礼堂中学生一直坐到我的脚下，窗外是大风雪，仍然聚集了很多人，因而不得不把喇叭拉出去），既觉意外，又很兴奋。

吃点心的时候，副校长余绍裔同志（研究苏俄文学的专家）说起去冬他访苏的见闻。评论家赫拉普钦柯（记得我五十年代读过他关于果戈理的几本专著）和长篇小说《岸》的作者邦达列夫对近年来中国文学评论极高，说："这才是真正的文学！""我们三十年代想写而不敢写的东西，今天

中国作家写出来了。”两本中国当代小说集*，一到书店就被读者抢购一空，连出版社的人有的都没有买到……

四月七日

一个姑娘爱上一个比她年长很多的人，结果导致双方的不幸。这种故事我听到不止一次了。中国人很奇怪：男方比女方年纪小，不好；大到一定程度，也不行。大连市那起悲剧，就因为男方比女方大了七、八岁，女方全家出动，大打出手，逼得自己的女儿和妹妹跳海自杀，也在所不惜。直到市领导表态同意，市电台广播支持，棒打鸳鸯的局面仍然不能结束。

今天听到的这一起事件，就复杂多了，然而年龄的悬殊仍然是一个主要因素。刘××，大学中文系毕业，被打成“右派”时三十岁。比一般“右派”改正晚两年，工资比同辈人低三至四级，人称“等外右派降三级使用”。

恢复教师工作后，“‘右派’脾气不改”。常在

---

* 一本短篇小说集，书名《人妖之间》；一本中篇小说集，书名《一个人和他的影子》。在苏联，小说与报告文学（称“特写”）往往没有截然的界限。至于体裁之为短、中、长篇，也不以篇幅的长短，而以内容为划分的标准。《人妖之间》是写一个事件的，故为短篇；《一个人和他的影子》则由于写的是一个人的一生，故为中篇。

课堂上抨击社会上的阴暗面，臧否人物，对“抬轿子”名作家和老写“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的作家表示鄙视，也无所顾忌地议论学校行政上的短长。

一个他教过一年书的女孩子，作文写得好，常来找刘老师，要求他写眉批、总批。她最爱看刘老师的文章，还每篇都抄到自己的本子上。常来借书、借报，问功课。上高二后，刘不教她了，仍不断来找他，进而讯问他二三十年来的经历。对刘老师表露了明显的同情和怜悯。又送来廖静文回忆徐悲鸿的文章给刘看，似乎愿学徐与廖师生关系的飞跃。于是，两人有了感情。姑娘还主动帮助老师料理日常琐事。

到一九八三年、八四年，形势严峻起来。社会上在“严打”，学校也逐渐对他们增大了压力，分别找来谈话。要求学生“划清师生界限”，对教师则提出严厉的忠告：“这种关系要负刑事责任的；再判你十年、八年，你就回不来啦！”

女生不愿断绝关系，仍不顾一切来找刘。姑娘的家庭，虽经校方一再工作，不置可否，只是对年龄的悬殊不满意。两人的关系似乎并未给社会造成什么危害。

到去年六月初，学校开始不指名地暗点刘了，刘负气向领导坦白摊牌，于是他被拘留、初审、

逮捕、复审、送押、候判了。据说市里不同意"从重从快"，才改判劳教二年。

师生恋爱，据我所知，在中国人习俗上自然是不予赞许的，但前有鲁迅与徐悲鸿，今有中国学生和外国老师相爱成婚、双双飞走之例。如果说那都是特殊"案例"，那么这位刘老师也够特殊的了，他经历了二十四年不幸(包括不得不鳏居)，却不能得到正常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享受的基本权利。再说，也无妨采取些变通的办法吧？比如规定女方毕业后再正式结婚，或将刘调转他校，等等。

刘被送往劳教场后，仍跟女方通过几次信，被发觉和严令禁止，关系中断了。

我向那姑娘现在工作的单位——一家非常大、非常现代化的饭店打电话，那边请示良久才答复我：她今天休息。再去了解，又经内部磋商，才告以实情：已被辞退了。理由是：不宜在"涉外"单位工作。

她犯了什么罪呢？我望着那高入云霄的大厦，不禁悲从中来。我两次体验过那里最现代化的设施。一杯咖啡两元钱，一块点心三元五。想必是为那现代化的设施和服务付出的代价吧？

想到为我们生活的现代化正在付出和必将继续付出的代价，又觉得那咖啡和点心是很便宜的了。

如果刘××属于“改正右派”，应罪加一等，那么那位姑娘，有什么理由在她遭到爱情不幸之后，又加之以失业的打击呢？

两个人的命运，值多少钱？

四月十一日

三年前，《艰难的起飞》一书定稿时，我认为台安县的问题一定解决了。两个月前收到一封信，告我那里的情况基本未变，我还吃了一惊。不久，就听到台安县四名律师有三人被捕，又是一惊。其中主要一名竟是我书中写过的王百义，这就既使我难过，又陷入久久的沉思。

几天来不断有来人、来信反映台安县问题的严重性，并为被害者强烈呼吁。听人倾诉和阅读来信中间，情绪激动不已，只恨一时无法脱身奔赴现场，助一臂之力！

在南京，听到一位作家说：我们生活里有些事情比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还要魔幻。的确如此。律师可以随时被制止发言辩护，被赶出法庭，甚至被当场带上手铐抓走，这不就有点魔幻吗？生活在和作家竞赛，它常常使艺术家的想象力黯然失色。在律师王百义的问题上，台安县诸公的创造又超出其先行者：王百义是被用四公分粗的大黑绳五花大绑，游街示众之后才收监

的，此时，有人还鸣鞭放炮以示欢庆，而主持这个欢庆仪式的，竟是该县司法局局长。

对王百义其人，我早有了解，可说是一个传奇性人物。幼时放猪，少年扛活，一字不识，参加革命后靠个人刻苦学习，竟能在三十岁上考入大学，一九六四年本科毕业。“文革”期间他因反对“文攻武卫”，饱受摧残。被逼逃亡一年多，回来后关押一年多，其后又劳改一年多。有记录可查的，就被打昏过十六次。一只眼被打瞎，腰骨被打折。几次抄家，洗劫一空，掘地数尺，连一家人睡觉的炕也被刨光了。只要是运动，例如“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每次他都是靶子。“四人帮”覆灭之后，他又被当作问题人物，几度欲加之罪，全家十几年间不断生活于风雨之中。妻子也因他而被打成“反军黑干将”和“现行反革命”，四户亲属在台安无法生存，不得不逃亡北大荒。

几位客人的谈话记录：

“文大”（即“文革”）那时候，王百义就宁折不弯，不断到上边去告状，那时候就得罪了不少当权的人物。“四人帮”垮台以后，他和这次也以“包庇罪”逮捕的徐启化，都担任过清查办主任，负责清理打砸抢分子和“三种人”。台安县虽是个小县，“文大”期间非正常死亡的竟有一百二十多人，打伤打残

的人就更多。王百义嫉恶如仇，就得罪了一大批人。

清查那时候受到很多干扰，很不彻底，很多有问题的人被包庇下来，有些人还被继续重用。他们扬言："再有一场文化大革命，非把他们打死不可！"这次被捕的律师里，王志成和王立双当时也是搞清查的骨干。王百义后来当"知青办"副主任的时候，因为不谋私利，不徇私情，卡的太死，抵制了不正之风，有些人认为他办事太绝情，又得罪了一批当官的。

这是他得罪的第三批人了。还有第四批呢。七九年到八〇年那个时期，省里和市里派来工作组，调查县里的问题——你在《艰难的起飞》里写的就是那一段，王百义帮助工作组做了一些工作，又反映了县委领导和"三种人"的问题，就又得罪了一大帮人。

这次抓三个律师……

我们台安县总共有四个律师，这回差点抓光了。群众都叫这次是一起"抓律师运动"。

王百义当了司法局副局长和法律顾问处主任以后，那些帮派分子和党风败坏的人物就对他更加恨之入骨，恨不能拿着放大镜找他的毛病。年年巧立名目，立案审查他。王百义虽然满腹委屈，又拖着伤残的身体，还是忍辱负重地拼命工作，为了学习（他在业大学法律呢），星期天和假日从不休息。可是他工作得越多，管的越多，那些人就越仇视他。那个姓齐的副局长这回为什么鸣鞭放炮庆祝王百义被捕？因为有王百义在，这个不学无术、满脑子私欲的人就显得太渺小了。

台安县人嘴里虽然不说，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这几个被捕的人，不说两袖清风，也没有什么大毛

病。尤其是王百义，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敢于斗争，不图名利。谁不知道，祖孙四代人住着两间台安县最次的房子。就凭他的职务、学历，在台安县你找不到第二个生活这么苦的人。没办法，在院里盖了两间简易房。别人盖楼都没事，而他这两间简易房却被多次审查！正因为他清正廉洁，某些县里的大人物就把他看成障碍，看成对自己的威胁，非除掉他不可。

先抓的是王志成和王立双律师，后来就不时传来王百义也被捕了的消息。直到他真正被捕，那两个月里，每天他家从早到晚不断人，有亲属，有同志，有识认的，有不识认的，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王百义还照常工作。家里人劝他，老王回答说："他们信不着我，可党和人民群众还信得着我呢。坐牢有什么了不起！台安是台安县，又不是台安国！"他还说："现在法制还不健全，人们请律师难，律师办案也难。为了维护党的三中全会路线，为了法制建设，我们个人做点牺牲是值得的。"

直到被捕的前两天，他在全县司法助理员会议上还说："在台安县，帮派势力和'三种人'恨我，败坏党风的人恨我，可是广大人民群众信任我，关心我。请代我转告全县广大正直的人民，我被捕的可能性很大，也许为期不远了，但暂时还没有。请不要浪费时间来看我和打听我的消息了。"

十二月十五日那天中午，在司法局局长齐兰山的鞭炮声中，老王被五花大绑游街的时候，围观的群众有流泪的，有跟着他走，不忍离去的。市、县检察院设宴庆功……

到现在，这些律师关了五个月了。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指出过要加强律师工作，

说这对实行法治的重大意义，引起全国的重视。可是台安县却轰轰烈烈地、接二连三地抓律师，把凡有律师参加的案件都重新复查一遍。这样下去，谁还敢当律师？谁还敢请律师？……

我决定同辽宁省法制报的主编杨会义同志通电话询问有关情况。杨会义就是当年省委派往台安的工作组负责人，应该是最了解情况的。

（注：关于台安县的报道，见《艰难的起飞》文集（湖南出版社）中《好人啊，你为什么这样软弱？》一文。省、市委当年派出调查组工作近十个月，查明县委班子已烂掉，打砸抢分子和以权谋私者十分猖獗。）

四月十三日

看来事情确在逐渐好转。今年以来不断收到读者来信报喜，说他的"问题"解决了。周大计文是一个，他是亲自登门报喜的。

我不记得帮过他什么忙了。他对我追述十几年的经历时，我才回想起来：哦，那年就是邝××同志写来的关于他的报告文学中一个情景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一个下乡知青为了改变本地贫穷落后面貌，背着几十斤山上高品位的铅、锌矿石长途跋涉，从四川跑到湖南，寻找销路。成功了，订了合同，喜气洋洋地回到汉源，从此就开始了

一场又一场灾难，直至被捕，判刑。

现在，周大计是“大渡河流域开发公司”的总经理，第一步是开采和加工花岗岩与大理石。此次来京，与意大利商人订下合同。对方以优惠价格，延期付款方式提供岩石切割机。用国产机械，一立方石只能切割出二十几平方的石板，进口机械却可切出三十几平方。周大计兴致勃勃、满怀信心地向我展示了他的公司发展的前景。我又一次被他打动了。谈话继续到夜半。

今晚思绪万千。单是一个四川，现在就有多少个周大计这样的能人！若没有两个三中全会，这些人身上的创造力将永远释放不出来。在全国，这种人合起来就是一支大军。中国的改革和富强何愁无望！

四月二十一日

这个人的事，我是在听人议论福建省那位名人的事情时最早听到的。两年前，还是三年前？那时的话题是：“改革家里，为什么一个又一个叫人以‘男女关系’的罪名给搞下来了呢？”第二个人，就是S市的市委书记。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叫黄××。

看风度，不象是个精明干练的政治家，倒有几分农民气息。身材也壮实得象个农民，手掌也

是厚厚的。第一个印象是：朴质，忠厚。他的夫人张××，S市前人事局局长、先进工作者，还有前秘书长刘××同来。

几个数据：一九七八年五月就任S市市委书记后，黄××主持下平反了四千八百多起冤假错案，处理了一千多名有严重打砸抢问题的人。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坏人屡次闹事，甚至敢于采取中国人罕见的聚众持利器威胁市委的手段。幸有当时主持清查工作的J省委书记高扬的支持，才能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老百姓叫黄××"青天"，坏人则咬牙切齿诅咒说："黄××得癌症死了！"与此同时，经济也搞上去了。一九七六年至七七年两年市财政赤字八十余万元；七八年当年扭亏，还节余六十七万元。政治工作好象也可以有发明创造，黄××既善于出新点子，也敢为人先。在全国，S市最早实行工程技术人员的招聘制，最早实行浮动工资，最早兴建商品房，最早实行亏损企业包干、不赔有奖的办法，最早推行工厂、机关的岗位责任制……财政专家刘××同志在这些改革中，出力甚大。总共有九项改革，S市都是全国的先驱。

也是难免罢，不断有怀疑的眼光投向S市，省里不断派检查组来。幸有省委书记张根生的支持，改革才能继续到一九八二年。

到八三年四月，省里又派检查组来，这回是专查黄××了，要他和副书记、市长刘××“检查交代”。他们不通。也不说是什么问题。查了“用人不当”，查了“子女就业走后门”、“拿洗衣机没给钱”、“到花园拿花不给钱”等等，最后都落空了。又说黄××“生活作风问题未交代”，“建议处分后调出”。他不服，写书面意见。这下糟了，“怎么，你还要告呀？”——“态度不好，当心后果！”从此别的不抓，专查这个事件了：说是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四日中午十一时三十分，黄××强奸人事局干部S。把黄××弄到C市，一关就是十四个半月，445天！“强奸”那天上午，黄××开会，十一点半才散会，有二十多人可以作证。女的呢，那天根本不在办公楼，很多人都见她去训练班了。黄××在长春受审，女的被弄到Y区围攻。始终弄不到真凭实据和口供。揭发这个事件的人选定的时机，是省党代会开会前夕，黄××可能被选为省委委员之时……

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此案。已经派出调查组。

我和黄××同志约定，七月间去J省采访。

四月二十五日

李花生又带着她的两个孩子来了。我便又想

起去年三月十六日那个日子。

三月十五日半夜，从黑龙江省伊春市（四千多里路呀！）开来车队，从新中街的旅馆里捕走王福绵。第二天下午，我打了两个多小时电话，得不到半点消息。最后一个人告诉我："人早不在北京，当夜就押往黑龙江省了。"逮捕证上写的是："侮辱，诽谤。"

侮辱和诽谤谁呢？我知道，他揭发的主要是一位前市委书记、现省委常委、部长。便打电话去询问。部长的答复是："这个人'文革'期间受过不少罪，多次被捕，还在深山老林里呆过很久。'四人帮'垮台后，给他平了反，还补发了三千多元工资……" 听来，不象是"三种人"了。但也有问题。"他对市委新班子不满，他可能叫几个老干部当枪使了。"

李花生和王福绵是到北京为女儿医治可能导致残废的腿病的。王福绵顺便到中纪委和中组部反映了省、市委个别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倒卖木材、包庇犯罪亲属等问题。王福绵几次来找过我，谈他本人十几年来奇特的经历和省、市有关人员的问题。

现在看来，这一切都不能轻信。当时我能肯定的事实是：王福绵被捕后，他妻子儿女的全部衣物都被扣押。天气已经很热，北京人已经穿裙

子了，这李花生和她的一子一女还穿着棉袄棉裤呢。被扣押的食物和药品全部变质。生活费用也断绝了来源。李花生的行动受到监视，她的东西被非法搜查。她丈夫被捕后，我为她写了一封信给黑龙江省一位同志，请帮忙解决她孩子的医病问题。李花生不在时，有人潜入她的住室，在搜查她各种私物时，特别把此信拍了照，做为追查王福绵及那位同志和坏人刘宾雁关系的罪证。

我不再过问此事了。忽然，七月十日北京某报四版头条以《继续造反，"三种人"寻衅闹事太猖狂；克服软散，伊春市坚决查处不宽贷》为题发表消息，把王福绵等人定为"寻衅闹事、要官要权的帮派小集团"头目和"三种人"。

《黑龙江日报》七月十二日第一版全文转载。那稿件是省委《党的生活》杂志负责人提供的，说是"已经省、市委审阅，全部属实。省委书记陈××主张在北京这家报纸上发表。"(但为什么这家刊物迟迟不发表自己这篇文章，非要在北京的报纸摘要"转载"后一个多月才在自己刊物上刊出呢？)八月四日，北京的那家报纸又一错再错，在头版的评论里把王福绵放在全国闻名、中央派人调查后才定性的湖南"三种人"王安义之前，作为全国头号"三种人"予以批判。《伊春日报》在转发北京报纸那条消息时，还特配发评论，把王福

绵定性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即“三种人”。

奇怪的是，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日伊春市检察院检察员的起诉书上开列的，又是另一些罪名了：一、扰乱社会秩序。指的是两年零五个月以前王福绵在为一个人辩护时，在法庭上不以事实和法律进行辩护，并公然侮辱被害人；怂恿某个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写大字报；扰乱房管所；到市委组织部要求落实政策，扰乱了一次会议。二、诽谤他人。在大丰区党委办公楼内张贴大字报，诽谤区法院院长胡××等人违法乱纪，依仗权势玩弄、对抗法律，非法拘禁揭发盗卖木材等严重犯罪的王××和肖××，使他们双双入狱，遭受多次刑讯逼供；包庇大丰区十大恶霸。三、包庇犯罪。王福绵受理一起案件时，“谎称”被告人患有精神病，唆使她装疯等。伊春市人民法院于九月十八日据此判处王福绵有期刑五年。

逮捕、报道和判决，依据的是三种不同的罪名。有点奇怪。罪行借似成立的证言，是在逮捕王福绵之后才去取的。有些证言是伪证。如果李花生的话可以相信的话，判决后王福绵上诉，至今已半年多了，省高级法院既未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也未开庭重新审理。

生活的复杂性真叫人眼花缭乱，是非难辨。去年三月十六日，我听到王福绵被捕时，心情很

坏，曾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后来见到报纸说他是“三种人”，我又觉得那应该是光明的一天了。我想，我可能上了王福绵的当：他说他“文革”初期因保护当时的市委书记曲××和老干部张××、反对动员上万名士兵搞“军事平息叛乱”和反对打砸抢抓与武斗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三次被捕坐牢，在“坏头头”学习班里被隔离三年；被发配深山劳改六年，在“反省”、“改造”和坐牢期间，屡受各种酷刑造成伤残。到一九八一年才得到平反，补发工资四千多元，还发了工伤证。这一切，我当时都相信了。我还根据他曾经收养几个孤儿这一条，断定他不会不是一个好人。他还说，他为了替受欺压的人打官司（大部打赢了），也得罪了公检法的一些干部。从三报一刊（《党的生活》）的报道看，王福绵就是个政治骗子了。

但是每当想到那位部长在电话中关于王福绵的介绍，我又不能不有些犯疑：从那几句话看，王福绵不是个“文革”的受害者吗？怎么又成了“三种人”呢？

罪名的不断变化，也有些不可思议。王福绵并不是个普通人，伊春市上下对他早有了解。“揭批查”那时候，市委不是还请他参加过“清查办”工作，和他一起议、查“三种人”吗？后来，他的

地位忽然变了。最迟，一九八四年就成立了他的专案组，并派人长期监视过他的行踪。"四人帮"时期和"四人帮"覆灭以后的时期，都发过对他的通缉令。怎么还会这样粗心大意，逮捕他的时候，发报道的时候，还闹不清他究竟犯的是什么罪呢？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六日对于我，到底应该是黑暗的一天，还是光明的一日呢？我感到迷惘了。

我很想弄清究竟。记者这个职业（作家就不同了，似乎完全不必操这份儿心）的责任也要求我去查明真相。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时却去不成黑龙江省。不知《黑龙江日报》和《伊春日报》的同行们有没有这个兴趣和这个条件？

眼下，当务之急是要为李花生和她的两个孩子找个住处。没有人提供免费床位，谁都不肯。怎么办？国胜和克夫正在为此奔走呢。

四月二十八日

乘21次列车来沪。又是用站台票上车的，这回可有点冒险，连软卧都爆满了。

恐怕国人很少知道，至少沈阳站平时旅客日吞吐量前年就达到了八二年春节时期水平：十五万人。上海市公共汽车、电车的乘客，一日为一千四百万人次！听说有人要公开批评上海市的交通拥挤，我怀疑。除非把上海市人口疏散一半，

或修建地铁（一公里造价需一亿元），神仙也没有办法。应该批评的，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而应是那些因失职和渎职而造成的祸害。

还没有普遍实行职工每年定期休假制度，农民还很少旅游，而车、船和飞机的客运已经紧张到这种程度了！铁路和交通部门已经作了最大的努力。那么，应该责怪的是谁呢？

曾经有很长一个时期，把人这种动物的需要看得过于简单了，似乎只要吃饱肚子（结果是肚子也不是经常能够吃饱）就行。人，好象除了开批斗会，唱赞美诗，就是出工干活，别无其他需要。不需要出去旅行（只有“外调”例外），不需要打电话互通信息，甚至信件及其邮递也可有可无。连住房都可以减免，更何况其他！与此同时，需要住房、有一天还需要旅行和通讯的人口，却在那里大翻其番。几十年欠下的债，几年就能还清？

买不到车票、船票和飞机票的同志，应该一边排队等候，一边批判左倾路线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果有什么人可以责怪的话，首先就是那些阻碍我们清除“左”的流毒、阻碍社会前进的人。

研究生温子健和《开拓》的编辑白雪和我同行。这是一次计划外的采访，时间又很紧迫，便决定不惊动上海熟人，由《中国海员》杂志的同志

帮助安排住处。

二十八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我来到上海，进行了最后一次采访，从此便告别新闻生涯了。那是一个很值得记忆的夏天。没有那次历史性的转折，也就不会有我的《第二种忠诚》和这一次采访了。

到东方饭店，周焘炎说起他“反右”时的经历——因为保护几个别人定要打成“右派”的人，他本人险些被打成了“右派”。姜浪萍却没有逃脱，二十一岁上就因为几首小诗成了个“极右分子”。算来，我们三个人里，有2.5个“右派”。

忽然想到，明年就是“文化大革命”发起二十周年了。此时采访上海海运学院的那段历史及其遗迹，就又增添了一点意义，文章可以说是献给“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的一个纪念品。

四月二十九日

到前海运学院副院长徐健家采访。他原来是我的同乡，山东沂水县人。

听他叙述他三十年来的经历，似乎找到一条线索。他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被第一个抛出来，借口是他曾是一个“反党集团”成员，而实质上却是因他不赞同党委书记王×抓权、在政工干部中培植一种势力。但公开的现行罪名却是“重

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五十年代为什么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呢？是由于他在区党代会上给一个领导干部提了意见——那人只说自己优点，不说缺点，又私下指出过那个人不该在填写履历表时把自己参加革命的时间提前了两年。“反党集团”的“头子”董明学，则是由于在五八年夏天那次市党代会上批评了市委书记柯庆施，说：“柯总是说我们工作不深入，可是他也没下来过几次，这不也是官僚主义吗？”但公开的罪名也不是这个，而是“有人骂党的领导人，这几个人没有检举”。

“我对一种人估计不足。他们平时在你面前服服帖帖、毕恭毕敬，老是院长长、院长短的。可是一转身就打你的小报告。运动一来，对风向特别敏感。一看谁要被打倒了，就一拥而上，真是如狼似虎啊。最近看《故土》，那里的安适之就很象我们那个党委副书记徐××。我把这种人看轻了，真象古人说的，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人之谔谔。

“我不重权，以为只要人正派，有能力，就应该大胆放手地给他权力，让他工作。而我们那位书记却很懂得权力的重要，他封官许愿，在自己周围搞了一个小圈子。拚命提拔他看中的人，把个刘××从人事科长提为人事处长，又提成党委组织部长。我看到了这个问题，当他又要把王××从人事科长提为干部处长时，就反对了。‘文革’

一开始，这就成了我一条罪名，把党委会记录张贴出来，说我'压制'那个王××！"

带领学生来抄徐健家的，就是那位党委组织部长刘××。也是党委的人，向徐健夺权，逼他交出院长办公室的钥匙。政工干部和某些学生党员，是批斗徐健的主力。

我去年在陕西省获得一个知识，现在又有所加深了：不要以为造反派就是红卫兵。

的确，红卫兵怎能弄到徐健的档案？怎么知道他有一段"反党集团"的历史？到哪里去找那些材料写"一揭"直至"九揭"徐健的大字报呢？一般红卫兵从"文化大革命"中又捞到了什么好处呢？

"整党期间，我在大会、小会上都讲：那些靠无中生有、打击干部爬上去的人，应该拿出自己的良心来。知不知道给别人造成的几十年苦难！不要老是说你也是受迫害者。老实说，你至少是犯了诬陷罪的！"

不知道这个呼吁能打动几个人的心。

谈起倪育贤来。现在海运学院的某些人把倪育贤做的好事除一件以外全部抹杀，就是那一件——一九七七年一月至三月在淮海路和国际饭店张贴为邓小平同志复出、天安门事件平反所写的诗篇，也打了对折，还说坐牢期间并未决定处死他。徐健说："怎么没有！大概是一九八〇年秋天，

高等院校负责人的一次会议上，口头传达了市委的一个意见，说华东师大的王申酉是杀错了。海运学院的倪育贤，也是个错案，险些杀掉的。倪育贤这个人我知道，别的院校的同志不知道，纷纷问我，我告诉了他们。所以，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还问过倪育贤，我知道他们不会告诉他这件事的。”

一九八二年，海运学院派两个人来征求徐健的意见。徐说：“要彻底否定‘文革’，学院领导人首先得消除派性。对‘三种人’要深查，不要因为是自己一派的，就再大的问题也不查；对提过不同意见的同志就无限上纲。不要再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一套。”

五月二日

生活里就有一些自己呼喊着要跳到小说里和舞台上去的人物。而且，至今还没有一个小说家或剧作家写过。

曾方庸，人称“曾铁嘴”，五十年代在人民大学时就是“反右”的积极分子。一九六五年，已是海运学院的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了。他再三动员远洋系一年级学生倪育贤对班同学公开讲说自己关于“个人主义是不是学习动力”问题的观点；先是称赞不已，继之以“保证‘三不’”。倪育贤讲了，

虽然特别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主义不应是学习的动力”，还是没用，立即开展了一场有组织的批判，若不是党委江熔出来保护，就要按既定计划把倪打成“反动学生”了。曾方庸意犹未尽，接着就对学生金杰重演了一遍那套伎俩，那孩子也上钩了，发表了一通对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的见解（还是经过导师“深化”了的）。又是一场批判，定为“反动学生”。

“文革”期间，此人又是积极的揭发者和批判家。批林批孔时，他的政治热情和理论兴趣达到高峰。工宣队就一个问题揪斗什么人时，他当场起来提供新的批斗对象。工宣队批判院革委会副主任时，他场场都是重点发言人。

“四人帮”倒台以后，海运局一位同志偶然碰到曾方庸，非常惊奇地问海院的人：“这个人怎么没有事？”

不但没有事，而且人家还当上了海运学院党委会的宣传部副部长，最近又提升为学生工作部部长了呢！

谁敢保险这位学生工作部部长不对学生拿出他二十年前对倪育贤和金杰用过的那一手呢？

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因为二十八年来他的经历证明，这是有利可图的买卖呀。

再看挨他整的人，远的不说，六十年代的倪

育贤、彭瑞年就到今天也没翻过身来。一九五三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彭瑞年，当了三十二年助教，人家戏称他是“终身助教”、“功勋助教”。曾方庸硬是不准他回马列主义教研室。倪育贤呢？海院党委办公室主任王雅珍公然叫喊他是“政治骗子”。

曾方庸却不是政治骗子。绝对不是。

五月三日

带来上海师范学院赵兴华寄给我的信，约定今天来谈。

看眼睛和面孔，不象经历过很多次坎坷的人。不时露出笑容，虽然那是比较复杂的笑。似乎看穿了很多东西，又象是无可奈何。

一九四七年在山东参加工作。在上海师院工作三十五年了。转折发生在一九五七年。但他不是“右派”。

那时师院还叫“二师”。赵兴华是做团的工作的，为加强反右派运动，派他到物理系任党支部书记。那是一个大系，学生近千人。

上半年，学校已经揪出两个“大右派”——数学讲师龚晨和物理系学生陈国钧。可是赵兴华到物理系左摸右摸，硬是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各系向院里汇报时，都讲了不少有关情况，赵兴华听了，也觉得够不上，还说了一句：“这类

情况我们那里有的是。"这句话，当即被党委组织部长记在本子上和心里头了。

这时生物系出了一件事：部队转业的青年团干部姚竞茂向团总支书记"汇报思想"，说他对一些问题也有看法，但不敢讲，怕一说出来也被定为"右派"。也是天赐良机，这时团委派下来一个干事叫王××的联系工作，是个敏感的人，得知此事，如获至宝，立即向党委汇报，并且建议一定要把姚的话引出来。党委同意，让王××去做工作。几番引诱，那青年就把真实思想说出来了。王××是个勇于创造的人，他把姚竞茂的话写成大字报，署上姚的名字，张贴出去。于是姚竞茂就成了全院最有名的"右派"。王××的功劳还在于他创造了一个样板。党委要求各系依法炮制，大抓"右派"。

赵兴华震惊了，迷惘了：共产党怎能做这种事呢？这不是骗人，害人吗？他苦闷极了，无处倾诉。院里每次开会，他如坐针毡。总是背向会议主持人，在一张纸上胡乱涂写。各系都搞了不少"右派"的材料了，唯独物理系却一个也没有，怎么办？党委给他的任务就是干这个呀！

团总支有人提出一年级新生郭中士有不满言论。赵兴华一惊。这人是他挑选来的，物理考了一百分以上（有附加题），各科考分都很高，只因

家庭出身不好，不能进入北大、清华。他是为怀才不遇而不满吧？我当初不取他，他也许就不会成为"右派"了吧？

按上面定的比例(1%)，物理系得出十个"右派"。可是赵兴华一个也定不下来。上边批评了。压力越来越大。他也想过：先定下来，我交了差，将来再纠偏行不行？不行，那是昧良心的事呀。不能抓，一个也不抓。天塌下来，大不了回家为民，我本来就是种地的。

五八年初，他被撤换了。检查几次也通不过，他索性不检查了。被发送农村劳动二年多。

赵兴华要改弦更张的话，是不难的。那以后的二十七年时光，历史给多少英雄豪杰提供了"摇身一变"和"反戈一击"的良机！在那些人眼里，赵兴华就是个十足的"憨大"，迂腐和顽固到不可救药的程度了。他是个农村里长大的苦孩子，因而死也不信"亩产万斤粮"、"万斤棉"的神话；他上过学，因而不能设想一个人怎能"三天摘掉文盲帽"。他学不会随帮唱影地歌颂三面红旗，又不能公开反对，他不愿苟且偷安，却又束手无策，他不能麻木不仁，却也无能为力；他不愿得过且过，却又位卑言轻。便只好在心里大喊："荒唐！胡闹！热昏！"

然而那个以别人名义写大字报的反右英雄王

××（他已经上升了，当时是下放干部的领队人）之流，却又一次得到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王××在党员大会上说："明年就要造农民新村。七一公社要从漕河泾造到七宝！以后农民生产，只要坐在家里揿揿电钮就行了！"他让大家来宣传这个大好形势。赵兴华却公开地表示：胡扯蛋！

从此，再开"大跃进"的会，他就愤然离去；要开会批他，他拒不出席；贴大字报批他，他撕掉；王××找他谈话，他大骂一通，扬长而去，最后，逼得他要用"退党"表示抗议，想把事闹大，惊动上级组织，为让他们察觉错误的政策已经把中国引到何等危险的境地。可是他错了，上级并不那么容易惊动，倒以"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开除了他的党籍，还降了他的级。他甚至几乎失去工作的权利，若不是党委副书记郝达干预的话。直到六五年（那时他的问题已甄别，党籍已恢复），还是经郝达一再提议，他才回到物理系工作。

几个月后，"文革"就开始了。又是那个王××，起来造反了。首先抛出的是郝达，罪状是"反对反右斗争"、"反对三面红旗"、"包庇漏网右派赵兴华"，当然是罪责难逃。赵兴华被拉到大字报前，被暴打不止，若不是一位女学生站出来制

止，他这条命也就没了。工宣队进驻后，他被强令去南京梅山劳动，一去就是七年。他依然旧习不改，对于倒行逆施的一切，什么“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邓”等等，一概消极抵抗。大字报从来不写，也不看，甚至连当时的报纸也不看、广播也不听、电影也不看了。

一九七八年，他被派到艺术系任党总支副书记。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前，全国首先演出话剧《于无声处》的，就是这个艺术系。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时，师院党委仍然讲对“文革”要三七开，它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艺术系的党总支就反对这种观点。赵兴华说：“什么‘三七开’！倒三七也不行！‘文革’错了，完全错了！……”

没有人说赵兴华是“政治骗子”。他的命运和倪育贤有所不同。只不过被晾在那里，至今已三年没有工作而已。

五月四日

想不到在上海碰到这么多山东老乡。范清林又是一个。也是上海师院的老人。他和赵兴华认识，也属于长年以来同左倾机会主义坚持斗争的那一种共产党人。近几年，他为帮助清理“文革”祸害，主动做了大量调查工作。他曾亲自向市教

卫办前领导人舒文同志汇报。为什么找舒文呢？“我五十年代就知道他，是个正直的同志。‘文革’中他从头到底一直受害，一九七八年才恢复工作。他了解受害者的心情。”果然，舒文十分重视他反映的情况。

几天来，我好象又重新读起“文化大革命”这本书，增长了许多见识。原来如此！有人把这段历史遗忘得过早了。我敬佩范清林这样的共产党人。本来，他不在其位，可以不谋其政；谁也没有交给他这项任务，他却硬要自动分担本来属于许多党委书记、纪检委、整党办、信访办中专司其职者的任务。

师院造反派是那十年里上海相当活跃的一支政治力量。华东和上海市等领导机关的大印，他们就抢了三十六颗（一说三十四颗）；以至市公检法某机关要颁发布告时，都得派人到师院去借印章用。但直至不久以前，有人还说：“什么？三十六颗？我们都不知道。”“查了，没那事。”去年上半年，才不得不承认，至少是抢了三十四颗。

有人劝范清林：“何必去查，去争？党风这个样子，靠你我能解决什么问题！”范的回答是：“正因为党风不好，才更需要我们大声疾呼呀。一切都好了，还要我们做什么？

“很多下情反映不上去。都爱听好的，听成绩，

不愿听问题。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他忧虑，他焦急，却并不灰心。他目前最关注的是用人问题。“真正有才干的人不屑于吹吹拍拍抬轿子。但是那些只说好话、顺风转舵、笑脸相迎、八面玲珑的人最讨人喜欢。选干部的人本人的素质也很重要。自己是草包的人，也爱草包。”

他说他写了一篇文章：《谈抹黑》。意思大概就是今天他对我讲的这些话：现在党内的各种不正之风，本非共产党所固有；社会上的各种问题，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可是有些干部一看到有人揭露、鞭挞这些坏东西，就说人家是给党和社会主义抹黑。岂不知真正抹黑的，正是那些被揭露和鞭挞的人。不许以文字或语言“抹黑”，正是保护了那些在实际生活中朝朝暮暮往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脸上抹黑的人。

他是“文革”期间被迫来到市卫生学校的。从一九七八年起，他就要求回上海师院，写过七次信，口头谈过四、五次，没有一个人表态。

五月五日

读英国哲学家的论文：《历史有意义吗？》

崇拜权势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象崇拜，是牢狱和奴隶时代的遗迹。崇拜权势产生了恐惧，这种情绪是

应该受到鄙视的。……当权的人喜欢受人崇拜，并且能把他们的愿望强加于人。

恐怕并不仅仅来源于牢狱和奴隶时代。一个不存在坐牢危险和已经远离奴隶时代的人，也会有对于权势的恐惧。当你的职称高低、工资多少、住房有无等切身利益都捏在某一个或某一群人手里的时候，你就不敢得罪这些人，甚至会违背自己的良心去讨好这些人。

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这却不是普遍有效的规律。近几天接触到的一些共产党员和非党员，就没有为可能失去或得不到某些利益那种危险所压倒；他们没有、或者摆脱了那种恐惧，敢于直抒己见，仗义执言。高压可以使某些人变成粉末，却使另一些人成为钻石！

我敬佩这样的同志。我感谢他们。不然，我们从哪里去了解上海海运学院的真实情况呢？

五月十六日

下午，在国际俱乐部会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启正，青年干部处处长张序敏，政策研究室主任余炳祥和科长杨小驯。组织部最年轻的干部金丹也来了。部长曾庆洪因下乡，未能见到，很遗憾。

是十日那次聚会上，《光明日报》的杨博向我介绍上海市委组织部在组织、人事工作上进行的一场试验，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才由杨博主持，有了今晚的会面。

我们生活中尽管有诸多令人忧虑和不满的现象有待消除，光亮的东西也确在不知不觉中增多，然而却往往不为人知。两个月以前，我忽然发觉，在许多省，省委的领导班子已经有了不止一次的更新，就总体说，是越换越好。现在，在上海又见到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组织、人事工作大改革的局面已开始打开。关于鉴定干部德才的新方法的试验，原来，早在八三年七月就由上海市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开始了。

赵启正一口纯熟的北京话，是学核物理的。三位部长都是搞自然科学的，现在却来研究和建树中国的人的科学了。赵启正说："我们的作法是力求作到客观地描述一个人。比如，由三个人分别写一个人，会写成三篇不同的文章。再由三个人看这三篇文章，这个人便会有九个不同的形象。语言本身就带有感情色彩。因而鉴定就很难精确。我们把人的素质分为四十个要素（指标），分为六组。在上、下、左、右几十个人中，征求意见，写到卡片上，由电子计算机处理，有点象心电图。

不过我们的统计图反映出来的不是心的状态，而是人的德才水平。这是量的测定，但又是有我们自己的内容的，比如我们给予'决断力'的内容，就不是资本主义那种勾心斗角的能力。这种作法可以给我们一种对一个人的德和才的更客观、也较公正的评鉴。也在不断改进，现在用的已是第四代评鉴表了。这种作法并不摒弃传统的干部考察方法，而是相辅相成。"

听听组织工作者自己议论组织干部（以及所有政工干部）的特点，很有意思。他们知道人们心目中留下的那种形象——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为政治、为阶级斗争服务，形象又怎么好得了呢？很多人又不学习新东西，"文化平均值"低于他们的工作对象。

"光是把组织部搞成'干部之家'还不够。组织部应该是'爱护干部部'。"部长、处长和主任一致表示，这是他们的工作方针。

曾庆红部长带领部下去同小学教师们见面时，提早二十分钟到场。他的一句话："我们没有早到，而是晚到了三十几年！"把许多老师感动得落了泪。有位同志说："落实政策是什么？有人以为在那里施恩，其实是偿还我们欠了多年的债。"——这话，更是令人激动。

护士节那天，组织部的同志们又去和护士们

见面了。护士们很感慨，说：从前一听说组织部的人找，"不是搞运动，就是写检讨"。现在呢？西装革履的组织部长请她们跳舞！

没想到会谈得这样投机，这么久。新时期德才标准的内涵问题，中国左倾路线的特点与人的地位和命运的关系问题，旧伦理观念与改革要求之间的矛盾问题；现行档案制度能否真实反映一个人的价值问题（"我们组织部不重档案而重一个人的实际表现"，"我们有十几个人专门在那里烧档案——那些不是帮助而是妨碍对一个人的认识的材料。"）；经济改革实践提出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问题……

"最近市里开青年作家会议，我也去了。"赵启正说，"为什么要去呢？因为我发觉组织工作者与作家有共同点。他们是写人的，我们是培养人的；文学对于我们认识人和爱人有帮助。我们愿意和作家多多交往，可惜我小说看得少。我请杨小驯定期介绍些作品给我。总之，在'人'这条线上，我们是相通的。政工干部也是有血有肉，能哭能笑的人，而不是成天说社论的人，不是成天教训人家'要'这样、'要'那样的人。"

这个组织部，三十几岁以下的人占40%。部长也不过四十几岁，却觉得必须不断从年轻人那里"充电"，一个月不和年轻人谈谈，就有老下去

的感觉了。

部长曾庆红常说："现在是农村包围城市，城市包围人事。"虽是借用别人的话，却流露了他对于重任在肩的使命感。

今晚，大大开了眼界。对照上海海运学院六十年代以来政工干部的素质和他们同校园的主人——教师之间的关系，引起很多思索。记得还是在一九七九年，我从清华大学的住房分配上最初产生了"喧宾夺主"这个观念。

五月十七日

上午如约访何满子夫妇，听汪浣芳说，吴仲华很想见我，我才下决心去看她和满子。张云鹄同志也来了。

除满子外，余三人皆是因我五七年的时候到上海电台的活动而受牵累，被定为"右派"或开除团籍的。吴仲华竟一再表示她后来的厄运主要不是由我造成的。而在五七年那个可纪念的夏天和后来漫长的岁月，我却觉得汪浣芳和她多半逃不掉灭顶之灾，主要责任在我。

几个一生中付出的牺牲仅次于死亡的人聚到一起，回首往事，竟毫无怨艾，仿佛谈论他人的经历。这种心理，和某些人的猜测很不一样，大概也是他们所难以理解的。大家更关注的，倒是

中国的前途。

满子的风度，很象兆阳，虽然二人的气质和经历很不相同。可惜老了，不然一定要拜满子为师，学习中国古典文学。

我们，这些幸存者，又是幸存者中的幸运者。但愿作家中的幸运者都能常常想一想，我们对于没有受到命运的偏爱的人，是负有一点责任的。

到明年，“文化大革命”就满二十周年了。也是粉碎“四人帮”的十周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场“大革命”的后果将越来越令人难以容忍。除非是还在美滋滋地嚼着“大革命”给他的果实的人；除非是对过于健忘的人。

我 的 日 记
刘宾雁 著
责任编辑：朱 正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83,000 印张：5.375 印数：1—10,100
统一书号：10109·2047 定价：1.00元

新书目：86—12、13